



*Voice Of Marxism-Leninism
Group Of EBOOK*

制作

毛主席语录

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出版说明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号召下，广大工农兵群众，进一步掀起了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

毛主席一贯重视学习历史，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光辉著作中指出：“**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学习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领会革命导师所讲的革命道理，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形势，从而有利于提高我们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学点历史》丛书，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而出版的一套历史普及读物。它不象一般历史书籍那样系统地、全面地去讲解历史，而是为了配合学习，简明扼要地、有所侧重地提供一些历史知识。《学点历史》丛书将分册出版，每册围绕一个中心（一本著作或一个专题），介绍一些有关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供工农兵学习时参考。

本书是《学点历史》丛书的第一辑，介绍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中提到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下面是有关体例的几点说明：（一）本书共三十八条，都是《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一书中提到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毛主席其他著作中提到的历史

事件和人物，没有在这里介绍。（二）《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中，多次提到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但这需要专书介绍，所以本书没有列为条目。（三）本书介绍历史事件的时间界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建国以后的事件，没有列入。（四）本书的若干条目，内容上有密切联系（如《辛亥革命》和《孙中山》），阅读时请注意参看。（五）《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一书中提到这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页码，都附注在每个题目的后面，以便翻阅。例如：“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七七）”，“（七七）”指《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一书的页码。

本书的编写组，由工人、解放军、专业工作者和本社工作人员组成。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一些工厂、部队、公社和学校的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这里一并致谢。

本书一定还存在着不少缺点甚至错误，希望广大读者给予批评，以便改正。

目 录

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七七).....	1
太平天国运动(一五).....	4
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七七).....	8
义和团运动(一五、七七).....	11
辛亥革命(六五、七八、八四).....	15
北洋军阀(六五、六六、八四).....	17
五四运动(一五).....	20
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六五、六六、六七).....	24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	
战争(六六、六七、七八、八四、八五).....	29
土地革命战争(一五、六六、六七、七八).....	33
新军阀(六六).....	39
日本侵入东北四省(六六).....	41
长征(八五).....	44
西安事变(六七).....	50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六六、六八).....	52
抗日战争(六六、七七、八五、一一七、一九三).....	57
一九四二年整风(一二七、二〇八).....	60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二八).....	63
解放战争(一一七、一九三、二〇六).....	66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四九、九八)	75
巴黎公社(九八)	77
第一次世界大战(九四、一八三)	81
俄国二月革命(五七、九八)	83
俄国十月革命(四一、五七、七八、九八)	85
第二次世界大战(九四、一八三)	89
* * *	
孙中山(六六、八四)	92
鲁迅(二一四、二一五)	94
老子(一八二)	98
孙子(六一)	99
魏徵(六一)	100
哥白尼(一六五)	101
达尔文(一六五)	102
黑格尔(四三)	104
陈独秀(六七、一〇五)	106
张国焘(一〇五)	108
托洛茨基(一〇五)	111
布哈林(四九、一〇五)	114
德波林(三五、四九)	116

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七七)

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是老牌的资本主义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战争是从英国强行向中国推销鸦片引起的，所以在历史上称为“鸦片战争”。

英国是当时世界上头号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头号殖民主义者。十七世纪英国侵入印度以后，就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贩运鸦片，就是它侵略中国、奴役和掠夺中国人民的一种手段。鸦片又叫大烟，是一种毒品，吸食鸦片上瘾的人身体衰弱，精神萎(音委)靡(音米)，逐渐成为废物。早在一七二七年，英国侵略者就把二百多箱鸦片推销到中国来。美国、葡萄牙等国是英国侵略中国的帮凶，当时也伙同英国一起向中国推销鸦片。他们贩运的鸦片逐年增加，到一八三八年，一年内就运进鸦片四万多箱。鸦片的大量输入，严重地毒害了中国人民，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随着鸦片的涌入，中国的白银被大量掠夺，引起国家的财政困难。在民族危机严重、国内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清朝道光皇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去广东查禁鸦片。林则徐在一八三九年三月到广州后，看见广东人民对英国侵略者怀有刻骨的仇恨和坚强的斗争意志，受到极大的鼓舞，立即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从六月三日到二十五日，林则徐在广州虎门海滩当众销毁了缴获英国不法商人的二百三十多万斤鸦片（其中有美商

鸦片一千多箱)。这一行动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这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一个胜利，它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对烟毒的深恶痛绝和反抗外国侵略的坚决意志。

英国侵略者为了进一步掠夺和奴役中国人民，早就准备发动侵略战争。一八四〇年二月，英国就借口广东查禁鸦片事件，向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

在英国侵略者武装进攻面前，除了被英国侵略者收买的少数汉奸之外，我国国内“**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林则徐从维护清朝封建统治的利益出发，这时也暂时地与人民站在一起，同仇敌忾(音开)，一致对敌。他组织了水勇、民团，会同清军加强防守。英国侵略军首先进攻广州，遭到失败；又进攻福建，也未得逞。

然而，中国沿海各省的清朝官吏，大多腐朽懦弱(音诺)弱，对英国侵略者根本没有防范。英国侵略者乘虚侵占了浙江定海，随后北犯天津大沽，蓄意威胁北京。这时清朝统治者惊慌起来，赶忙撤换林则徐，另派投降卖国的官僚琦善等人和英国人“谈判”。结果在英国侵略者的压力下，在广东川鼻洋签订了开放广州，割地、赔款的《川鼻草约》。草约签订后，清朝统治者感到“天朝”的尊严受到损伤，又决定向英国宣战。一八四一年五月，清朝军队在广州的战事中失利，广州城外的炮台被英军占领。清朝驻广州的腐败官僚奕(音亦)山等人立即投降，与英国侵略者订立休战条约，以六百万元作为“赎城费”，换取英国侵略者不进占广州城和撤出占领的炮台。

广州人民激于爱国义愤，纷纷自发地拿起武器反抗英国

侵略者。一八四一年五月三十日，广州北郊三元里人民反英斗争进入高潮。这一天，英军千余人在城外四处抢劫，当他们经过广州城西北三元里时，遭到以三元里为中心的一百零三村的几万人民的英勇抗击。三元里人民把英军重重围住，杀死英国侵略军二百余人。英国侵略军的头子义律率军来援，也被围住。义律派人求救于广州的清朝官吏，清朝卖国官吏竟对三元里人民使用种种欺骗、威胁的伎俩，保护被围困的英国侵略者逃回船上。广州附近县、镇的广大人民，也都奋起抗击英国侵略者。广州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武装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先声，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反抗精神。

英国政府为了勒索更多的利益，又进一步扩大战争。从一八四一年八月起，英国侵略军先后攻占了福建的厦门、浙江的镇海、宁波等地。一八四二年六月，英军从吴淞口闯进长江，攻到南京城下。英国侵略军所到之处，广大人民都起来坚决抗击。杀敌人，烧敌船，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可是清朝统治者，这时却在英国侵略者的军事讹诈下，妥协投降，可耻地签订了《南京条约》，鸦片战争到此结束。

《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按照条约的规定，英国除了掠夺二千一百万元“赔款”外，还强占香港作为它侵略中国的基地，强迫清朝政府开放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五处做通商口岸，等于敞开中国的大门，任凭侵略者自由出入，日后侵略者逐渐在各口岸设置“租界”，作为扩大侵略的据点。中国还丧失了关税的自主权，外国侵略者的工业品可以在中国市场自由倾销，吮吸中国人民的

血汗。这个条约是外国侵略势力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枷锁，标志着中国从独立自主的封建社会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

战争期间，美国派军舰到中国海面为英军声援，充当英国侵略者的主要帮凶。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美国和法国施展狡诈手段，先后强迫清朝政府同他们签订了类似的不平等条约，中国的独立和主权进一步被破坏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随着中国社会性质的改变，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具有了反对外国侵略和反对国内封建压迫的双重任务。一八四〇年揭开了中国近百年的伟大革命运动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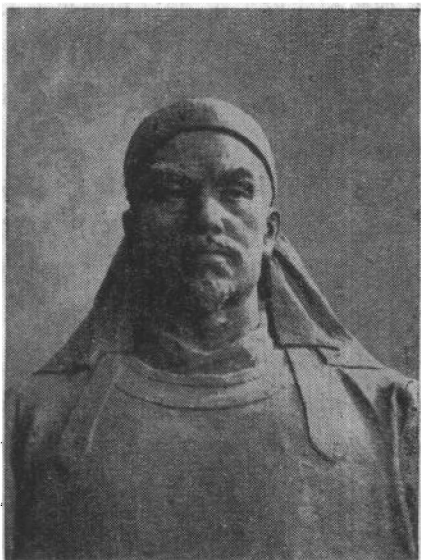
太平天国运动_(一五)

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在十九世纪中叶，是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和外国侵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侵略者和清朝封建统治阶级一起，穷凶极恶地压榨中国人民，广大劳动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为了争取解放，不断奋起反抗。据不完全统计，从一八四三年到一八五〇年，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就有七十多起。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的上空升起了“太平天国”的旗帜，洪秀全领导的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爆发了。

一八五二年，太平军在洪秀全领导下，突破了敌人的包

围，杀出广西，攻入湖南，挺进湖北。在进军途中，太平军一方面同清军进行英勇的战斗，打得清军“文武弃城远避，兵勇闻风先散”，“莫不望风披靡”，惊呼“几无御之之法”。一方面杀逐官吏和地主豪绅，烧毁田契、债券，对封建统治秩序进行革命的扫荡；同时，又放出狱囚，把财物分散给贫苦人民，受到贫苦人民的热烈拥护。



洪秀全(塑像)

广大劳苦群众纷纷加入太平军，革命队伍迅速扩大，由刚出广西时的两万多人，到一八五三年一月攻占武汉三镇（武昌、汉口、汉阳）时，增加到五十多万人；到定都南京后达到一百万人。革命队伍迅速发展壮大，表明了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正蓬蓬勃勃地向全国发展。

太平军占领武汉三镇后，乘胜前进，顺长江东下，以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在一个月內，破九江，占安庆，进逼南京。一八五三年三月十九日，太平军便攻下了南京这座江南第一大城。

太平军攻下南京后，在这里定都，改名天京，建立起一个和清朝封建政权对峙的农民革命政权。洪秀全立即进行了一

系列政权建设工作，制订和颁布了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①。在军事上，派出北伐军和西征军两支队伍。北伐军经安徽、河南、山西、河北，一直打到天津附近。西征军也接连打了胜仗，攻占了安徽、江西、湖北大片土地。到一八五六年，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达到了极盛时期。

清朝封建统治者在军事上节节失败的情况下，除了调集各地反动军队加强围堵外，又指使曾国藩、李鸿章等大刽子手先后组织湘军、淮军对太平军反扑。

太平天国攻下南京以前，在它占领的地方都没有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武汉、九江、安庆等地，得而复失，清朝政府很快又在那些地方恢复统治，致使革命政权没有广大而巩固的后方基地。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虽然派兵北伐，但是没有全力以赴，没有和当时北方另一支较大的农民起义军——捻军密切配合，失去了捣毁清政府老巢的极好时机，给了清朝统治者以喘息的机会，使它能够重新纠集反动力量，向革命势力反攻过来。

① 《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关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革命纲领，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关于土地制度的规定，它宣布“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提出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主张。它明确规定了“凡田分为九等”，“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好(田)丑(田)各一半”，孩童减半的分田办法。还规定各家农副业生产所得，除自用外，其余都缴归“圣库”(国库)；婚丧等额外开支，都由“圣库”按规定发给，等等。这个纲领集中地表明了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性质，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明确规定把土地平分给农民耕种，强烈地反映了当时千百万贫苦农民渴望取得土地的革命要求，具有彻底地反对封建制度的意义。但是，《天朝田亩制度》所制定的平分土地的办法，给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所设想的那一套方案，是不切合实际的。要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和平均一切社会财富，以求人人平等，是不可能实现的。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清朝政府非常恐慌，企图扑灭太平天国革命政权，连忙调集反动军队，先后两度在天京城外和扬州一带建立“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对天京形成包围圈。随着北伐、西征两路军的失利，天京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在革命的危急关头，青年将领陈玉成受命统率太平军的主力部队，在一八五八年攻破了敌人的“江北大营”。以后，太平军又攻破“江南大营”，并进军苏州、杭州、宁波，直逼上海，不仅击溃了清军的进攻，也使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受到沉重打击。

太平军的胜利进军，使中外反动派万分惊恐。中外反动派相互勾结，把上海作为反革命据点，镇压革命力量。一八六〇年，在美国驻上海领事的授意下，美国政治流氓华尔，搜罗了一帮子美、英、法等外国侵略分子，拼凑起一支国际反革命武装——“洋枪队”。中外反革命力量互相勾结，在江浙地区疯狂地向太平军反扑。太平军的英雄们并没有被敌人的洋枪洋炮所吓倒，立即以革命的武装进行了有力的反击，一次又一次地把侵略军打得落花流水，狼狈逃窜。连华尔这家伙也在浙江的一次战役中被太平军打死，受到了应得的惩处。但是，由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由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在政治上、军事上犯了许多错误，尽管太平军在这些战役中取得了胜利，仍然无法根本扭转整个局势。在中外反革命势力联合进攻下，局势日益严重，一八六四年六月，洪秀全逝世。七月，天京陷落，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失败了。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个革命运动是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中农民革命战争发展的最高峰，也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

的。太平天国英雄们高举战旗，拿起刀枪，敢于斗争，先后克复六百多个城市，力量扩展到十八个省，几乎席卷了全中国。它沉重地打击了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坚决地抗击了穷凶极恶的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揭开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序幕。中国农民在太平天国革命中所显示的无比威力，“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表现了农民不仅是反封建斗争的、并且也是反侵略斗争的主力军。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继承了太平天国的革命传统，奋不顾身地和中外反动派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七七)

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是日本发动的扩大侵略朝鲜、并向中国扩张的侵略战争。这一年是中国旧历甲午年，所以又叫甲午战争。

自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日本在一八六八年以后，资本主义逐渐发展，它同封建势力相结合，逐步成为最富于侵略性的帝国主义。日本政府制定了妄图征服朝鲜、中国，甚至全世界的野心勃勃的侵略政策。一八九四年以前，日本已经进行了一些侵略活动。一八九四年日本对朝鲜扩大侵略，准备进一步侵略中国。同年八月，中国清朝政府海军在黄海遭到日本海军的突然袭击，双方进行了激烈战斗。中国海军实力并不比日本弱，但是，由于清朝政府对外一贯妥协投降，海军将领的腐败无能，而打了败



台湾军民抗击日本侵略军(画)

仗，船舰损失将近一半。在这一仗中，海军一些军官和士兵表现了英勇无畏的精神。“致远”舰中炮后，舰长邓世昌下令开足马力猛撞敌舰，中途被水雷击沉。“经远”舰舰长林永升力战牺牲，全舰官兵奋战到最后，壮烈殉难。由于中国海军战士英勇奋战，日本海军的损失也很惨重。

一八九四年十月，日本侵略军渡过鸭绿江又从陆路进攻中国。在此民族危机严重的时刻，中国国内“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日本侵略者占领九连城和安东（今丹东）之后，分兵进攻岫（音袖）岩（辽宁东南部），当地

人民自发地进行武装抵抗，打死打伤许多敌人。日本侵略军企图北犯辽阳，辽阳的地方官吏支持群众组织民团，协同清军扼守险要，连续击退敌军。日军不敢侵犯辽阳，转而南下侵占海城、牛庄、营口等地。

日本侵略军在进攻九连城、安东的同时，又分兵在辽东半岛东岸庄河县花园口登陆，十一月占领大连、旅顺，并在旅顺残酷屠杀了许多中国军民。一八九五年一月，日军在山东荣成登陆，袭击威海卫港，清朝的北洋海军舰队在港内全部覆没。

清朝统治者在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面前屈膝投降，于一八九五年四月，派卖国贼李鸿章到日本马关(现名下关)“议和”，在日本压迫下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日本强迫中国“割让”辽东半岛(沙皇俄国对辽东半岛早有野心，它认为日本占领辽东半岛于己不利，纠合法、德两国进行干涉，结果中国以白银三千万两向日本“赎回”辽东半岛)、台湾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赔款二万万两，允许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开设工厂等。《马关条约》标志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使中国进一步殖民地化。此后，日本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华输出资本，在中国开设工厂，进一步加深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中国大片土地的割让，直接助长了帝国主义分割中国领土的野心。日本占领了中国的台湾，从中国勒索到巨额赔款，取得了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特权，这些，都加速了日本向帝国主义转化的进程。

《马关条约》的签订，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特别是台湾同胞，他们不愿做亡国奴，强烈反对日寇侵占台湾。到日寇正式强占台湾的时候，台湾同胞就拿起武器，进行英勇的

斗争。从一八九五年台湾被侵占，直到一九四五年台湾归还中国，在日本帝国主义残酷殖民统治期间，台湾同胞争取重返祖国怀抱的斗争从未间断。他们英勇不屈，前赴后继，同日本帝国主义占领者进行了可歌可泣的长期斗争，大规模的起义就有二十多起。这充分说明中国人民是外国侵略者永远征服不了的，中国的领土是外国侵略者永远分割不了的。

义和团运动(一五、七七)

一九〇〇年爆发的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爱国武装斗争运动。

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进一步深入中国。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恶浪。在一九〇〇年以前，德帝国主义强行“租借”了胶州湾。沙皇俄国取得了在我国东北修筑铁路、开矿的特权，强行“租借”了旅顺、大连。英帝国主义“租借”了九龙半岛和威海卫。法帝国主义“租借”了广州湾。十九世纪末，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划定了“势力范围”：长江中下游省分被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广东、广西、云南被划为法国(一部分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山东被划为德国的势力范围；东北被划为沙俄的势力范围；福建被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美帝国主义则抛出了臭名昭著的“门户开放”政策，企图在“利益均沾”的幌子下，使整个中国变成它的势力范围。严重的民族危机，促成了革命的爆发。富于反侵略斗争光荣传统的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挺身而出，拿起武器，高举反



义和团英勇杀敌的场面(画)

帝斗争的大旗，和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强盗，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搏斗。

这场反帝爱国运动，首先在山东兴起。在甲午战争中，山东遭到日寇的残酷蹂躏。一八九七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在附近地区为非作歹，压迫人民。帝国主义对中国疯狂侵略和掠夺，并利用天主教、耶稣教的传教士（牧师、神甫、主教

等的统称）进行文化侵略和间谍、特务活动。山东有天主教、耶稣教大小教堂一千多处，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入教的土豪劣绅、地痞流氓经常欺压人民，无恶不作。一八九八年山东各地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逐渐高涨。散布在这一地区的义和团，原是一种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秘密的反清组织。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这种秘密结社就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借以团结起来进行反帝斗争的组织形式。山东的义和团到处设立拳厂，练习武术，四处捣毁教堂，驱逐教士，展开了反教

会的斗争，并屡次击败前来镇压的清军。到一九〇〇年春天，山东的义和团进入河北，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广大乡村的贫苦农民，运河沿岸的失业工人，以及城市的劳动群众，踊跃参加革命队伍。妇女也组织了“红灯照”“蓝灯照”等团体，勇敢地投入战斗。他们到处焚烧帝国主义进行侵略活动的据点——教堂，英勇地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就在这年夏天，义和团胜利地进入北京和天津，控制了清朝统治的心脏地区。这一斗争很快扩展到北方各省，南方也有许多地方起来响应，形成一场震动全国的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

在义和团控制京津、全国反帝形势高涨的情况下，清朝政府玩弄反革命两面手法，一面支持义和团，并向帝国主义宣战；一面又同帝国主义勾结。一九〇〇年，帝国主义者开始最凶恶的武装干涉，纠合了世界上的反动力量，组成德、日、俄、法、英、美、意、奥八国的侵略联军来镇压中国人民。由英国驻华舰队司令西摩尔率领的各国侵略军二千多人，打着要“保护使馆”的旗号，从天津向北京进犯。义和团对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义和团英雄们以刀、矛等原始武器，甚至赤手空拳同使用洋枪洋炮的侵略军展开血战。在廊坊一带，义和团把侵略军打得落花流水，狼狈逃窜，这一仗，歼敌四百多人。同时，天津和北京的义和团群众和部分清军，也同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帝国主义侵略分子吓得丧魂落魄，在天津的逃入紫竹林租界区，在北京的躲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

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恨得咬牙切齿。七月，急忙又增调大批侵略军，屠杀义和团群众，并大肆烧杀抢掠。

各帝国主义在天津强占土地，扩大“租界”；在北京则划界分区，实行军事占领。沙皇俄国更是野心勃勃，分兵两路，入侵东北，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伟大导师列宁在一九〇〇年写了《中国的战争》一文，愤怒地谴责了帝国主义者特别是沙皇俄国的侵略罪行，指出：“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它们盗窃中国，就象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象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列宁严正地指出：“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

侵略联军侵占天津、北京后，清朝反动政府完全暴露了帝国主义走狗的真面目，一面向帝国主义投降求和，一面公开命令清军伙同侵略军镇压义和团。由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义和团群众看不清中外反动势力互相勾结的实质，对帝国主义还只有感性认识，表现为笼统的排外，对洋书、洋货、洋式生产工具一概排斥。结果，这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政府极端残酷的镇压下失败了。

“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义和团英雄们的豪言壮语和他们在京津失陷后坚持斗争的实际行动，表明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者敢于斗争决不屈服的英雄气概，显示了中国人民誓与民族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义和团的英勇卓越的武装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粉碎了帝国

主义瓜分中国、灭亡中国的迷梦，同时也动摇了帝国主义走狗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加速了这个反动王朝的崩溃。义和团运动的革命业绩，在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史册上，永远闪耀着灿烂的光辉，并一直激励着中国人民。

辛亥革命（六五、七八、八四）

辛亥革命，发生于一九一一年（中国旧历是辛亥年），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一九〇五年，在孙中山的倡议和领导下，组织了一个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反清士绅联合的革命组织——同盟会。在同盟会章程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驱除鞑（音达）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号召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同盟会成立后，曾在广东、广西、云南的边境地区多次发动反清武装起义，都没有成功。一九一一年八月，同盟会在上海设立中部总会，以加强对长江流域各省革命力量的领导。当时在湖北有两个较大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都在清朝的新军中秘密地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新军士兵和一些下级军官加入这两个革命组织。这年夏天，四川、广东、湖南、湖北地区兴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清朝政府出卖铁路主权给帝国主义的保路群众运动。同盟会和文学社、共进会中的革命党人感到革命时机已趋成熟，准备发动起义。

十月九日起义领导机关遭到破坏。十月十日晚，武昌新军工程营中的革命党人提前发动武装起义。他们冲出营房，迅速攻占了设在楚望台的清军军械库，夺取枪支弹药。武昌城各处革命党人听见枪声也纷纷起义，并不断奔赴楚望台。接着，起义士兵分三路猛攻清朝在两湖(湖南、湖北)的统治中枢——总督府。经过一夜激战，武昌全城被起义军占领。两三天内，起义军先后占领汉阳、汉口，革命在武汉首先取得胜利。

武昌起义胜利后，湖南、江西、陕西、贵州等省陆续起义响应。到十一月下旬，全国已有十七个省宣告脱离清朝政府而“独立”，其它各省区也正在进行反清斗争。广大农村中反封建斗争的风暴更加激烈。参加这个斗争的包括农民、工人、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和会党群众。各省纷纷独立和席卷全国的群众自发斗争，汇合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潮。清朝的反动统治就在这个革命高潮的猛烈冲击下土崩瓦解了。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十七省区的代表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革命恨得咬牙切齿。武昌起义爆发后，英、美、日、德、法等国匆忙调动军舰驶到长江中游一带，威胁革命军。德国军舰并向革命军开炮轰击。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帝国主义各国不肯承认。它们眼见清朝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坠，就物色上了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大刽子手袁世凯作为新走狗。它们为袁世凯上台大造反革命舆论。

一九一一年十月至十一月间，清朝政府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领兵攻占汉口、汉阳，隔长江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

正当袁世凯攻陷汉口、汉阳取得某些有利地位时，帝国主

义就匆忙出面“调停”。在“和谈”中，革命派屈服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压力，同意在袁世凯承认共和、逼迫清朝皇帝退位的条件下，把政权让给袁世凯，充分反映出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清朝皇帝退位。随同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朝的垮台，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也就最后结束。但是，由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无产阶级的自觉参加，所以辛亥革命流产了，政权落到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的手中，中国仍然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

北洋军阀(六五、六六、八四)

北洋军阀是袁世凯建立的封建买办军事政治集团。

在清朝政府垮台后，袁世凯是中国反革命势力的集中代表，是一个最反动、最丑恶的人物。早在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后，清朝政府派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式陆军，他凭借这支军队，为反动统治阶级忠实效劳，对农民起义进行了血腥镇压，得到中外反动势力的赏识和重用。一九〇二年以后，袁世凯当上了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①，实际上，掌握了清朝的

^① 总督，清代地方最高军政官吏，管辖一省或二、三省的地方军民要政。直隶总督是当时河北地区最高军政官吏。北洋(当时我国称辽宁、河北、山东等沿海各省为北洋)通商大臣，管理天津、牛庄、登州三个海口的对外通商和交涉事务。

军事、政治和外交大权，他乘机把他的军队扩充到七、八万人。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依靠这支反革命武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又利用当时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妥协性，窃夺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权，在北京建立了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联合专政的第一个北洋军阀政府，开始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时期。

袁世凯是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他为要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他做皇帝，丧心病狂地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一九一五年五月完全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①。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支持后，袁世凯及其党徒积极公开地从事恢复帝制的活动。十二月袁世凯宣布从中华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起改为“洪宪”元年，积极布置正式“登基”的丑剧。袁世凯的卖国罪行和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和强烈反抗。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云南首先起兵反袁，全国各省响应。以孙中山为首的一些革命党人也在各地进行声讨袁世凯的活动。在全国一致声讨下，迫使袁世凯于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不得不取消帝制。做了八十三天短命“洪宪皇帝”的袁世凯，六月初，在全国人民的唾骂

^① 二十一条是卖国贼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的卖国条约。全约分为五大项，二十一条款。主要内容是：（1）承认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一切侵占特权，并加以扩大；（2）延长日本租借旅顺、大连两港和南满、安（安东，今丹东）奉（沈阳）两铁路的期限为九十九年，承认日本在南满和内蒙东部的特权；（3）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4）中国沿海港湾岛屿只能租借给日本；（5）中国政府必须聘用日本人作政治、军事、财政顾问，中国警政及兵工厂由中日合办。武昌与九江、南昌间及南昌与杭州、潮州间等铁路的建造权让给日本，日本在福建有投资筑路和开矿的优先权等。

声中可耻地死去。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为三个派系：一个是由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以段祺瑞为头子的皖（音碗）系（大多为安徽人）；一个是由英、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先后以冯国璋、曹锟、吴佩孚为头子的直系（大多为直隶即河北人）；以张作霖为头子的奉系，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长期统治东北。在南方，还存在着与北洋军阀有联系的以云南军阀唐继尧为头子的滇（音颠）系和以广西军阀陆荣廷为头子的桂系。此外，还有很多地方小军阀，他们或者割据一省（称为督军），或者割据数县（称为镇守使），凭借反革命武力，为害一方。从此，就开始了持续十年之久的北洋军阀争权夺势的混战局面，使人民受到极大的痛苦。

北洋军阀的混战，主要有三次大规模战争。第一次，是一九二〇年七月爆发的直皖战争，直系与奉系联合，打败掌握着北京政权的皖系。第二次，是一九二二年四月爆发的直奉战争，奉系败退山海关外。第三次，是一九二四年十月爆发的第二次直奉战争，最后由奉系控制了北方各省。直系军阀吴佩孚流窜两湖地区，另一后起的直系军阀孙传芳控制了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奉直两系的混战，以及各系内部的火并，这以后依然持续不断。在军阀混战期间，北京的北洋军阀政府随着各派军阀势力的增长和削弱，也不断地更换。据统计，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八年，十六年当中就更换了四十七届内阁，其中寿命最短的只有六天。

北洋军阀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他们出卖主权，搜刮民财，镇压革命，屠杀人民，把中

国人民驱向无以为生的绝境，这就不能不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孙中山曾领导过多次反对北洋军阀的革命斗争，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帝国主义、军阀的破坏，结果都失败了。

一九二四年，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在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群众运动的影响和支持下，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到一九二七年春，先后消灭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几十万军队，革命势力迅速地发展到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一九二八年六月，张作霖被迫从北京退回东北。至此，北洋军阀的统治时期结束。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叛变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放弃对统一战线和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革命成果被蒋介石所窃取。蒋介石以美、英帝国主义为靠山，继承北洋军阀的衣钵，建立了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国民党新军阀统治。

五四运动_(一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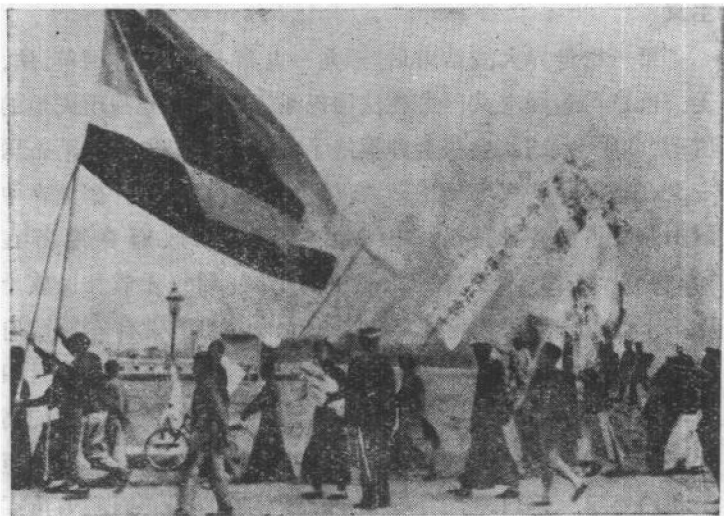
五四运动，是指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爆发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革命运动。这个运动是在伟大导师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是在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号召之下发生的，是在中国国内工人阶级壮大的条件下发生的。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划出了一个完全新的时代，即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

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革命已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九一九年一月，战胜国英、法、美、日、意等帝国主义国家在法国巴黎召开重新分割殖民地的所谓“和平会议”。会议无理拒绝了中国人民提出的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等项正义要求，决定由日本接管德国在中国山东侵占的各种特权。中国北洋军阀卖国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本来已经十分尖锐，帝国主义的无耻掠夺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更加激起了全国人民群众的愤怒和反抗。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几千人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游行示威。他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山东”、“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并一致要求严惩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订“二十一条”时的外交次长，当时任交通总长）、陆宗輿（订

“二十一条”时任驻日公使，当时任币制局总裁）、章宗祥（当时任驻日公使）。队伍游行到赵家楼，包围了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了藏在曹宅的章宗祥。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派军警对学生的爱国运动进行残酷镇压，逮捕学生三十多人。北京全市学生立即总罢课，并通电全国表示坚决抗议。天津、上海、长沙、广州等地学生也纷纷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学生爱国运动在全国蓬勃地开展起来。

从六月三日开始，北洋军阀政府又在北京进行了更大规模的镇压，两天内逮捕学生近千人。这一残酷野蛮的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不可遏（音扼）止的更大愤怒。在这严重时刻，中国工人阶级挺身而出，站到斗争第一线，英勇地投入战斗。六月五日，上海六、七万产业工人首先举行声势浩大的政治罢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的游行队伍

工，加上手工业工人和店员，人数达十万以上。接着，唐山、长辛店、南京、天津、杭州、武汉、九江及山东、安徽等地的工人也相继举行了罢工。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上海和全国各重要城市的学生、商人和市民也先后举行了罢课、罢市。这样，原来主要由知识分子参加的爱国运动，现在发展成为不但有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这就是“六三运动”。这个规模空前的广大群众反帝爱国运动的不断高涨，迫使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撤消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职务，并答应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次爱国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五四运动又是彻底地反封建文化的革命运动。毛主席指出：“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口号，对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思想公开宣战。在五四运动中，通过革命知识分子，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从而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成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新文化运动。“六三”以后，他们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和组织工人运动。这样，五四运动就促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

革命从此走上了以中国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六五、六六、六七)

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是指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各革命阶级、阶层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认识到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胜利，必须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有各革命阶级、阶层、各革命派别参加的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为了正式确定这一方针，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专门讨论了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会上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认为，当时的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应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则认为，中国只有工人阶级才革命，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不革命，共产党不应当和国民党合作，如果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就会“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竭力反对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反对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反对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改组国民党。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张国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作了坚决的斗争。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大会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民

主主义立场，估计了把国民党改组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的可能性，确定了和国民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并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独立性。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以后，一直进行着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但屡遭失败，找不到挽救中国的出路。“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孙中山不顾国民党内顽固派的反对，坚决地实行联合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维埃俄国，联合中国共产党，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推动下，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主席出席并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决定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两党合作。在大会的《宣言》中，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大会通过了在保持我党独立性的原则下，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这次大会的成功，标志着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此后，中国共产党又帮助孙中山建立了黄埔军官学校和国民革命军，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为北伐战争打下基础；同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也蓬勃发展，预示着革命的高潮就要到来。

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右派集团一贯反对孙中山的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逝世后，他们公开打出反共的旗号，妄图打击日益发展的革命力量，破坏统一战线，篡夺领导权。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国民党右派进攻下，妥协退让。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否定农民的革命性，使无产阶级的领导成为一句空话。这样，中国革命面临着一个紧要关头。

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伟大领袖毛主席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光辉著作。毛主席在周密的系统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各阶级、各阶层，明确划分了敌、我、友，正确地解决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毛主席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毛主席还指出：国民党右派，是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这些光辉论述，有力地批判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打击了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气焰。毛主席这篇光辉著作，代表了党的正确路线，它奠定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思想，照耀着中国革命前进的道路。

但是，由于陈独秀坚持其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无视毛主席的英明论断，这时，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帝国主义的走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就乘机进行篡夺革命领导权

的反革命活动，先后制造了所谓“中山舰事件”^①和“整理党务案”^②，排挤和打击共产党。当时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张坚决反击，制裁蒋介石，巩固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可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又拒绝这一正确意见，顽固地坚持以退让换取“团结”，并命令在国民党中央担任部长职务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这样就让蒋介石右派集团篡夺了革命领导权。

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由于我党的正确领导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骨干作用，由于广大工农群众的热烈支援，北伐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把革命旗帜插到长江流域，占领了半个中国。北伐战争的胜利进一步推动了工农运动的发展。这期间工农组织发展极为迅速，全国加入工会的工人达二百八十万人，加入农民协会的农民达九百五十万人，其中江西、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尤为高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① 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制造的反革命阴谋事件。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蒋介石命令以中国共产党人为舰长的中山舰开到广州黄埔港，又散布共产党“阴谋”暴动的谣言。以此为借口，于二十日清晨逮捕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包围苏联顾问住所，拘留了黄埔军官学校及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全体共产党员，强迫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从此蒋介石便篡夺了第一军的军权。

② 蒋介石为排斥共产党人，篡夺革命领导权，准备反革命政变，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的人数不得占委员的三分之一以上，不得任国民党中央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共产党给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须先经过两党联席会议讨论等。当时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这个反动提案被通过，共产党员担任的国民党中央部长，大都被国民党右派所代替，蒋介石乘机窃取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主席、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等重要职务，篡夺了革命的领导权。

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使帝国主义及国内的买办地主阶级怕得要命。帝国主义者一面增兵上海和长江下游，进行武装干涉和威胁；另一方面在统一战线内寻找和收买代理人，在一九二七年初，就同蒋介石秘密勾结。地主豪绅和一切反动分子疯狂地反对农民运动，恶毒诬蔑农民运动是什么“惰农运动”、“痞子运动”、“糟得很”，并借以打击共产党。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唯恐吓坏了资产阶级，追随地主豪绅，也跟着叫嚷农民运动“过火了”、“糟得很”，不许农民组织武装，不许收缴反动民团枪支，不许农民进城进行武装斗争。

为了反击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攻击和诬蔑，引导全党坚决地依靠农民推进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毛主席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至二月五日，亲自到湖南农村考察农民运动。三月，发表了光辉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主席在文章中热情地歌颂了伟大的农民运动“好得很。”同时，列举事实批驳了诬蔑农民运动的澜言，并主张普遍“建立农民武装”、“一切权力归农会”。毛主席充分估计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指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同时强调指出，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贫农是农民中最革命的力量，“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毛主席这篇光辉著作，代表了党的正确路线，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解决了无产阶级领导权

的中心问题——农民同盟军的问题。历史证明，按照毛主席这条革命路线，中国的民主革命就能取得胜利。可是，当时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根本拒绝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统一战线中，一切联合，否认斗争，放弃了对农民、对城市小资产阶级、对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陈独秀顽固地坚持其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国民党右派的压力下完全投降；追随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竟命令武汉工人纠察队将武装交给国民党右派。因此，当地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和七月先后背叛革命，疯狂地屠杀工农群众的时候，党不能组织人民进行有效的抵抗，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了失败。

蒋介石、汪精卫的背叛革命，国、共两党合作的破坏，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也就被破坏了。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 革命战争_(六六、六七、七八、八四、八五)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又叫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指的是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战争。

一九二三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和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实现了国、共两党合作；并在斯大林同志领导的苏维埃俄国帮助下，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创建了黄埔军

官学校，组织了国民革命军。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工农运动蓬勃发展。一九二五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湖南组织农民协会。一九二六年，毛主席在广州举办“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来自二十一个省的三百多名学员，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这对于当时以及后来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据一九二六年六月统计，农民协会遍及十二个省，全国乡以上农民协会已有五千三百多个，会员近百万人。工人运动方面，一九二五年爆发了五卅运动^①和省港大罢工^②，掀起了全国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到一九二六年六月，全国有一百二十四万多人加入工会，工会组织近七百个。同一时期，国民革

① 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打伤工人十余人，激起全市人民的愤怒。三十日，英帝国主义开枪屠杀声援的工人群众十余人，伤无数，造成“五卅惨案”。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了二十余万人的总同盟罢工，五万学生的罢课，绝大部分商人也举行罢市。北京、广州、汉口、南京、重庆、香港等许多城市也纷纷起来声援，举行游行示威、罢工、罢课和罢市，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怒潮。但在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威胁和利诱下，民族资产阶级动摇，中途停止罢市，破坏了反帝统一战线。工人罢工坚持了三个多月之久。这一运动，严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大大提高了全国人民的觉悟，推动了革命运动的迅速高涨。

② 省港大罢工，是广州、香港两地工人为支援“五卅运动”而举行的政治大罢工。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九日，香港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了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罢工人数多到二十五万，并有十余万人愤然离开香港回广州。广州英、美、日商行和沙面租界的工人也参加罢工。六月二十三日，英、法帝国主义向经过沙面租界对岸沙基的群众游行队伍开枪射击，打死五十余人，伤一百七十余人，造成“沙基惨案”。全国人民极为愤怒，积极支援省港大罢工。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并组成二千多人的武装纠察队，严密封锁香港，使香港对外交通断绝，成为死港。罢工坚持一年又四个月，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并对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准备北伐战争起了巨大作用。

命军肃清了广东的军阀势力，巩固了革命根据地。

为了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组成了八个军共十万人的北伐军，于一九二六年七月，从广东分三路出兵北伐。主要的一路，在工农群众积极支援下，迅速占领湖南；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在湖北的汀泗桥、贺胜桥，击溃北洋军阀吴佩孚的主力，攻占武汉。其他两路分别从江西、福建向北进军，从一九二六年底到一九二七年初，先后攻占南昌、九江、安庆、南京等地，消灭了北洋军阀孙传芳的部队。一九二七年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汉口、九江的工人，驱逐英帝国主义，收回了两地的英租界；上海工人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配合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占领了上海。至此，北伐军占领了长江以南大片土地，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工人、农民的革命运动更加迅猛地发展起来。

美、英、日等帝国主义眼看它们的走狗北洋军阀阻挡不住中国革命的发展，于是，一面直接武装干涉，增兵上海，炮轰南京；另一面，在革命阵营中寻找新的走狗。

隐藏在革命阵营内部、当时窃踞北伐军总司令的人民公敌蒋介石，早就准备着背叛革命，投靠帝国主义。在北伐前，他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一九二六年冬他到南昌后，立即派人同美、英、日帝国主义秘密勾搭，要求帝国主义支持他搞反革命叛变。一九二七年春，蒋介石同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封建势力勾结成熟，得到他们军事上和经济上的支持，便猖狂地向革命进攻。从一九二七年三月起，蒋介石就指使其走狗，在各地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捣毁工会等

革命团体，反革命气焰日益嚣张。在这革命的紧要关头，叛徒陈独秀仍然顽固地坚持投降主义路线，拒绝毛主席的正确主张，对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步步退让，甚至交出工农武装。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武装反革命政变，公开背叛革命，这就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四月十八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也是最黑暗的一个反动王朝。“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

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助长了敌人的反动气焰，致使反革命事变连续发生。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又策动湖北、湖南的反动军官叛变革命。五月十七日，武汉政府所辖独立十四师反动师长夏斗寅率部叛变。北伐军从河南赶回，在武汉工人纠察队配合下，击溃了叛军，保卫了武汉三镇。五月二十一日，汪精卫指使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叛变。在共产党员领导下，湖南十万武装农民军，准备总攻长沙。可是，陈独秀等右倾机会主义者竟下令退却，并解散农民武装。结果反动派乘机反扑，使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紧紧追随陈独秀，把武汉工人纠察队全部武装交给国民党。七月十五日，同蒋介石早就秘密勾结的大卖国贼汪精卫，在武汉进行了同样的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和汪精卫公开合流，叛变革命，背叛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以“清党”（即清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为名，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他们封闭工会、农会，镇压工农运动，屠杀工农群众；他们提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把革命人民推入血海。

这样，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被残酷地镇压下去。

在我们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第一次大革命，是一次伟大的革命演习。这次革命，教育了人民，锻炼了我们党。这一时期，我们党还处在幼年阶段，在这个阶段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个阶段的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排斥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导致了革命的失败。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出的：“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不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工农运动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而只依仗其暂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其结果是帝国主义命令它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伸出千百只手来，首先把蒋介石拉去，然后又把汪精卫拉去，使革命陷于失败。”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了，但中国革命并没有因此中止。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中国人民又展开了新的斗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土地革命战争（一五、六六、六七、七八）

土地革命战争，指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三七年七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内革命战争。由于它是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为主要内容，所以叫作土地革命战争。这次战争发生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之

后，总共经历了十年，因此，也叫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或十年内战。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社会的政治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蒋介石窃夺了大革命的胜利果实，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建立了反革命独裁统治，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群众；曾经参加过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倒向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边，小资产阶级上层发生动摇，有的脱离了革命队伍；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占据了中心城市，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地主豪绅阶级对工农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中国革命处于暂时的低潮。

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蒋介石的屠杀所吓倒。蒋介石、汪精卫、陈独秀这些反面教员，使我们懂得了：“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懂得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为了挽救革命，继续斗争，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举行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正确的方面是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它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开始。“八一”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的光荣节日。南昌起义错误的方面是没有到农村去发动和武装农民群众，建立根据地，而是城市中心，依赖外援。八月七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纠正了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撤消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八七”会议以后，毛主席亲自领导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秋收起义，向井冈山进军，建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在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

地，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组织工农政权，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胜利的道路。

但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遭到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反对。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者，被蒋介石的血腥屠杀吓得惊慌失措，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胡说什么中国民主革命已经完结，无产阶级只有等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从投降主义走向取消革命。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者，则否认大革命的失败，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形势是所谓“不断高涨”，企图以大城市为中心，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起义，拒绝在农村中建立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拒绝积蓄革命力量。当时党内还有坚持悲观主义思想的人，他们和陈独秀的取消主义一脉相承，把时局看得漆黑一团，散布种种悲观论调。他们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认为形势“未可乐观”，前途“渺茫得很”，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这充分表明了悲观主义者为天空中乌云翻滚的暂时现象所迷惑，被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所吓倒，看不到革命的主观力量，怀疑中国农村根据地即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对伟大的人民革命事业发生了动摇。

伟大领袖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反错误潮流的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中国革命开辟了胜利的航向。毛主席及时地总结了经验，先后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重要著作，科学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矛盾和阶级斗争形势，洞察了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进

行了有力的批判，从理论上系统地阐明了在中国武装夺取政权不能象在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农村，而只能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毛主席说：“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毛主席提出的中国革命的这条发展道路即“工农武装割据”，包括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的建设。

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无产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在农村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所以，中国革命战争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无产阶级只有正确地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彻底地发动农民群众的土地革命，才能使自己在农村中建立起强大而可靠的革命堡垒，才能进行武装斗争和根据地的建设，才能有真正的人民革命，才能有中国民族的真正解放。为了正确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保证土地革命斗争的正确进行，一九三〇年，毛主席根据长期以来对中国社会状况的考察和对农村各阶级的科学分析，总结了历年土地革命的经验，为我党制定了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这条路线是：依靠雇农贫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

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条土地革命路线，是党在农村中的一条坚定的阶级路线。它正确地解决了民主革命时期党在农村中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根本问题，为党胜利地领导农村的反封建斗争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红军推进到哪里，党就在那里发动土地革命。土地革命的开展和正确的进行，摧毁了根据地内的封建制度，解放了广大农民，建立了革命政权，使党获得了雄厚的群众基础，推动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支持和保障了革命战争的胜利进行。毛主席说：“中国革命战争虽然是处在中国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反动时期，然而能够胜利的，因为它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农民的援助。根据地虽小却有很大的政治上的威力，屹然和庞大的国民党政权相对立，军事上给国民党的进攻以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有农民的援助。红军虽小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人员是从土地革命中产生，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战斗的。”从井冈山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开始，到一九三〇年，红军已经发展到十万人左右，分布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安徽、广西等十多个省，建立了中央区（赣南、闽西）、湘赣区、湘鄂赣区、闽浙赣区、湘鄂西区、鄂豫皖区^①、广西左右江区等十多个主要革命根据地。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迅速发展，使蒋介石反动派十分恐慌。从一九三〇年底起到一九三一年九月，蒋介石先后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红军在

^① 江西省简称赣（音干），福建省简称闽（音敏），湖南省简称湘，湖北省简称鄂（音饿），浙江省简称浙，河南省简称豫（音玉），安徽省简称皖。

毛主席亲自指挥下，在根据地人民大力支援下，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政策和不抵抗主义，招致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全国人民积极要求武装抗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并领导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这时蒋介石提出了“攘（音嚷）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继续推行反革命内战政策，于一九三二年六月和一九三三年十月又发动了对红军革命根据地的第四、五次反革命“围剿”。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斥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举行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遵义，党中央召开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即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把党的路线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遵义会议是我们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接着，我们党又粉碎了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路线。红军在毛主席亲自领导和直接指挥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胜利地完成了长征。

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侵犯，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党中央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抗日。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

事变”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全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土地革命战争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土地革命战争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革命离开了毛主席的领导，离开了毛主席革命路线，革命就受挫折，就失败；紧跟毛主席，照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事，革命就前进，就胜利。

新 军 阀 (六六)

中国现代史上所称的新军阀，是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后代替北洋军阀而起的代表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国民党新军阀，其主要代表是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唐生智、冯玉祥、阎锡山等人。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九二八年十月曾经指出：“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

从一九二七年秋到一九三〇年下半年，在国民党统治下，新的军阀之间的斗争遍及大半个中国。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矛盾日益激化，在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操纵和支持下，国民党新军阀之间连绵不断地进行战争。毛主席指出：“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

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的战争。”发生在这个时期的新军阀战争，主要有：一九二七年十月，蒋介石、李宗仁和汪精卫、唐生智的战争；同年十一、十二月，蒋介石和广东军阀的战争；一九二八年四、五月间，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战争；一九二九年三、四月间，蒋介石和李宗仁、白崇禧的战争；一九二九年八月，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的战争；一九三〇年四月，第二次蒋和冯、阎的战争。

国民党新军阀为了维持其反动政权，在帝国主义支持和援助下，建立了一支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的反动军队和空前庞大的特务组织，对全国人民实行残酷野蛮的统治，工人、农民在大革命时期争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均被剥夺，革命的工会、农民协会被封闭解散，工农群众惨遭迫害和屠杀，工农革命运动被破坏，地主豪绅反攻倒算，抢夺农民田产，农业生产遭到严重摧残，农民生活日益痛苦，苛捐杂税不断增加，其名目繁多是历史上少有的。各派军阀为了相互争权夺利，扩大自己的势力，连年不断地进行混战，加重了人民的灾难，更加激起了人民的反抗。

国民党新军阀虽然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加强了它的反动统治，但它只能把主要力量放在城市中，它不可能在全国广大农村中普遍建立有力的反动统治，这就使革命在农村中有发展的阵地。军阀之间的混战和割据，也削弱了反革命的力量，对革命根据地的包围和进攻不得不暂时有所放松，使革命得到了发展。毛主席说：“只要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的，则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也将是能够继续的。”所以，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的各派军阀相互间进

行继续不断的战争，是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及时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这些重要经验，英明地指出，在中国武装夺取政权不能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农村，而只能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日本侵入东北四省^(六六)

东北四省指抗日战争前我国东北部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个省，即是现在的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以及河北省的东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的地区。

日本帝国主义早就有侵略中国的野心，妄想变中国为它的独占的殖民地。经过长期的精心策划和战争准备，趁蒋介石反动政府集中力量打内战的时机，发动了掠夺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开始了对我国进行大规模的武装侵略。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盘踞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命令它的“守备队”炸毁了沈阳附近柳条湖的南满铁路路轨，却贼喊捉贼地说这是中国军队干的，并以此为借口，突然炮轰沈阳，同时在吉林、黑龙江发动进攻。这时，驻守沈阳和东北各地的国民党军队接受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的命令，撤退到山海关内，致使日本侵略军很快地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中国的一大块土地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一九三三年三月，日本又侵占了热河省。五月三十一日，国民党反动政府同日本在

塘沽签订了卖国的“塘沽协定”，在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北四省的“合法”性，出卖了祖国的大片土地。

“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侵略行动和蒋介石的卖国罪行，点燃了全中国人民的抗日反蒋怒火。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富于反抗外来侵略斗争革命传统、不畏强暴、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声势浩大的反日浪潮。

中国共产党代表全中国人民的要求，九月二十日，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宣言。二十二日，号召全国各抗日阶级团结起来，组织游击战争，武装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表了《对日宣战通电》，提出“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主张。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号召和领导下，全国沸腾起来了，抗日怒潮遍于全国。

深受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我东北三千万同胞，怒火高万丈，仇恨满胸膛，响应共产党的号召，组织起来，开展游击战争，和一部分爱国军队一起，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武装抗日斗争。一九三四年后，一切东北抗日的队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成为统一的东北抗日联军，长期坚持了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群众不怕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英勇地举行反日大示威。有着反帝斗争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举行了反日大罢工，码头工人拒绝为日本船只装卸搬运货物，在日厂做工的六、七万中国工人一律退出了日厂，致使日厂全部瘫痪。几十万工人还组织了抗日联合救国会，并建立了义勇军，要求发枪抗日。其

他各地的广大人民群众也掀起了反日浪潮。中国青年学生怒不可遏，纷纷举行反日大罢课，组织各种抗日救亡团体，走上街头，集会游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在工农、学生抗日浪潮高涨的同时，一九二七年退出了革命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时也通过《大公报》、《申报》发表了不少要求抗日，停止内战，实行民主政治的主张，加入了抗日救亡运动的行列。国民党及其军队这时也在发生分化。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在江西进攻红军的第二十六军，响应了中国共产党抗日号召，于江西宁都起义加入红军。一九三二年一月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驻上海的十九路军，在上海和全国人民抗日浪潮的影响和推动下，激于民族义愤，奋起抵抗日寇。一九三三年日寇进攻热河等地时，冯玉祥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政策，赞成共产党的团结抗日主张，组织了抗日同盟军，抵抗了日本侵略军。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当着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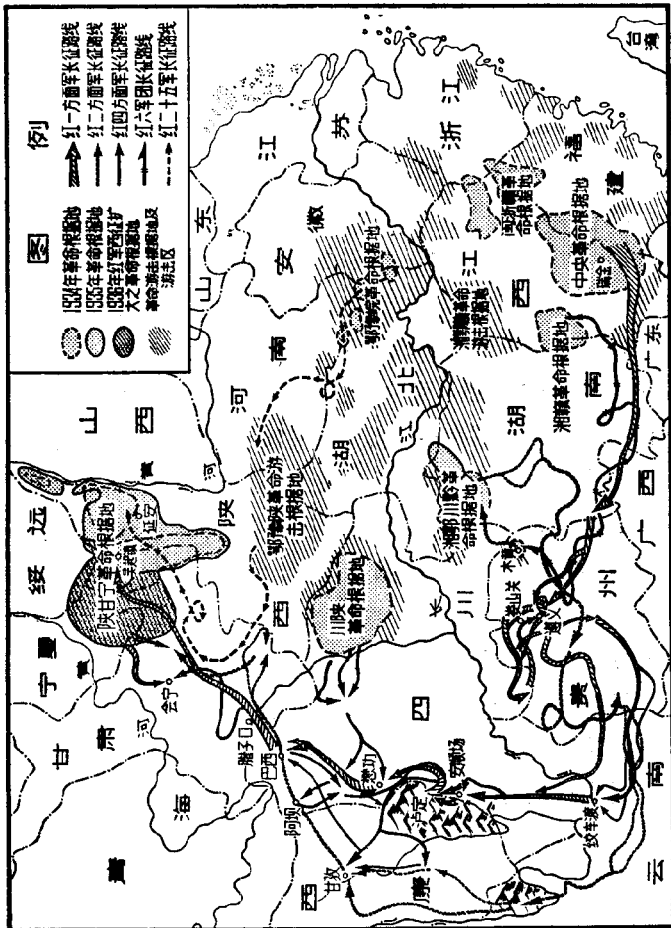
中国各族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同仇敌忾，团结奋战，依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长期的人民战争，经过八年的英勇抗战，终于取得了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胜利。

长 征(八五)

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倾其全力纠集一百万军队，对红色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正确的政治和军事路线，红军英勇转战一年的第五次反“围剿”终于失败了。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长征途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之间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长征初期，由于红军战士的英勇作战，红一方面军从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雩都等地出发，经广东、湖南到广西，一连突破了国民党匪帮设置的四道封锁线而进占贵州的黎平，一九三五年一月强渡乌江天险，占领了遵义城。然而，“左”倾机会主义者在战略退却中实行逃跑主义，他们既不在红军指战员中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使很多人不明白长征的意义和进军的目标；又不做长途行军作战所必须的准备工作，后方机关庞大和携带大批辎（音滋）重，行动作战迟缓，在敌人围追堵截的情况下，处处被动，不能主动地打击敌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这就使红一方面军在短短的三个月中，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减员到三万多人，造成了极大的损失。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使中国革命陷于极端危险、困难的境地。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示意图

在这危急关头，伟大领袖毛主席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毛主席对广大干部进行了大量耐心的启发教育工作。在付出了极大牺牲的情况下，广大干部从血的教训中逐渐觉悟，在毛主席领导下团结起来，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坚决斗争。经过革命实践的反复检验，证明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即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把党的路线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从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就一直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遵义会议以后，红军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直接统帅下，整顿了队伍，减轻了行装，一反过去的被动局面，运用机动灵活、迂回曲折的战略战术，采取了运动战的方式，以神速的行动迷惑敌人，主动地寻找敌人的薄弱部分加以歼灭，并抛开强敌，大踏步地向四川、云南之间进军。

一月下旬至三月间，红一方面军转战于黔（音前。贵州）北、川（四川）南、滇（云南）东北地区，四渡赤水，使敌人处处挨打，并在二渡赤水重占娄山关再占遵义城时，一举歼灭了敌军二十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巨大胜利。随后，再入川南，又挥师折回贵州，强渡乌江，直逼贵阳，并分兵佯攻黔东，威逼昆明，迅速进军云南，把蒋介石搞得晕头转向，疲于奔命。在敌人慌乱之际，五月，红军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强渡水深流急的大渡河。从此，红军跳出了数十

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长征中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接着，进军四川、西康边境，翻越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占领了川西的懋（音茂）功。六月，红一方面军和同年三月离开川陕革命根据地，向四川、西康两省边境转移的红军第四方面军^①在懋功会合。这时，在红四方面军工作的投机分子、个人野心家张国焘，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反对红军北上抗日，提出向四川、西康之间少数民族区域无限制的退却逃跑主张。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决定红军继续北进。六月下旬至七月上旬，红军连续翻越梦笔山、长板山、大鼓山，把二千七百里行程和终年积雪的大雪山抛在脚后，到达四川松潘附近的毛儿盖地区。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会议，批判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和宗派活动，决定红军必须迅速集中北进。毛儿盖会议以后，红军分别组成了左右两路军继续北上抗日。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四、三十两个军组成右路军，在毛主席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绕过松潘、通过荒无人烟的草地向班佑前进；由红四方面军的主力 and 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组成的左路军，经阿坝出草地，进至班佑与右路军会合。当左路军进到阿坝后，张国焘不服从中央命令，擅自率领左路军和在右路军的红四方面军部队一同南下，向四川、西康边境的天全、芦山、大小金川一带退却，并非法地另立“中央”，打出了叛党黑旗，破坏党、红军的统一和团结。毛主席党中央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

^① 红军第四方面军原战斗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由于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在蒋介石反动军队发动新的攻势后，一九三二年十月，张国焘竟擅自放弃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率领红四方面军的主力撤退至川北、陕南一带。

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决定将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组成了北上抗日支队。红军在毛主席领导下继续前进。九月中旬，攻占四川、甘肃边境的天险腊子口。接着，越过白雪茫茫的岷山，进入甘肃南部的岷县。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其光辉的《长征》诗中概括了英雄红军这段光辉的战斗历程：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接着，红一方面军以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在短短的时间里，浩浩荡荡地开进甘肃南部，相继突破了敌人的渭水防线和会宁——静宁、平凉——固原间的封锁线，翻越了长征途中最后一座高峰——六盘山。一九三五年十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保安县（今吴旗县），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

红一方面军在毛主席英明领导和直接统帅下，以超乎寻常的革命毅力，战胜了自然界的无数艰难险阻，跨过了波涛汹涌的江河，越过了终年积雪的大山，穿过了荒无人烟、满布沼泽的草地，转战十一个省，经过许多不同的民族地区，进行了三百八十多次的战斗，击溃了数十万敌人的尾追、围攻和堵截，攻占了六十多个县城，长驱行程二万五千里，胜利地完成了战略大转移的伟大任务。

原驻湘赣革命根据地的红六军团，奉中央命令，一九三四年八月开始突围转移，在冲破了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敌军的层层封锁后，十月到达贵州东北部，和在这里进行游击斗争的红二军团会合，组成红军第二方面军，开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

根据地。自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走后，在鄂豫皖根据地新建立和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第二十五军，于一九三四年九月自河南的罗山地区出发，进军西北，经豫西、鄂北，十一月进入陕西南部，开创了鄂豫陕革命游击根据地，后来去陕北。当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后，战斗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二方面军冲破敌人的层层围追堵截，也开始了自己的长征。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由湖南的桑植出发，经湖南中部，一九三六年一月进入贵州，挥兵西进，突破乌江进入黔西，进军云南，渡过金沙江。六、七月间进占西康的甘孜，和红四方面军会合。这时，张国焘又企图煽动红二方面军脱离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阻碍红二、四方面军到陕北与党中央会合。红四方面军的绝大多数同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感召下，和红二方面军一起粉碎了张国焘破坏北上、分裂红军的罪恶阴谋，七月，红二、四方面军自甘孜出发，通过草地，十月到达甘肃的会宁地区。这时，红一方面军也派出一支队伍转战到这一带来迎接。于是，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三支主力红军在陕北胜利会师，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这时候，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到不足三万人。我们党的力量，数量上暂时减少，但是由于路线正确，质量上却比过去更强了。这不足三万人的队伍是党最可宝贵的精华，是中国人民宝贵的财富，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支柱。

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毛主席在总结红军长征伟大历史意义时生动地写道：“**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

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

西安事变^(六七)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国民党内部主张抗日的两派爱国分子——东北军的张学良和十七路军（西北军）的杨虎城，联合起来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对日妥协和对内屠杀的反动政策，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这就是有名的“西安事变”，又叫“双十二事变”。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它吞并全中国的狂妄野心，一九

三五年纠集大批侵略军加紧侵略华北各省，策动汉奸进行了所谓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在河北东部二十二个县成立一个傀儡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工农群众的利益，代表全民族的利益，号召实行全国人民总动员，实行千百万人民群众对日本侵略者的全面抗战路线。一九三五年八月至一九三六年八月，中共中央多次向全国、向国民党中央发出宣言和通电，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号召各党派和全国同胞，组织抗日联军，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还大力领导全国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并对国民党内部进行了分化和争取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日方针迅速得到了一切爱国人士的热烈拥护，促使国民党内部发生激烈的分化。被蒋介石派到陕西、甘肃一带进攻红军的国民党东北军和西北军，他们进攻红军屡遭失败，觉悟到“剿共”没有前途。在东北沦陷、西北危急的形势下，他们中的一些爱国官兵，对蒋介石的“绝不抵抗”政策日益不满。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帮助下，一九三六年初，以张学良、杨虎城为首的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并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蒋介石不仅拒绝张、杨建议，而且派遣大量嫡（音笛）系部队进入陕西，继续布置“剿共”军事，准备加紧进攻红军，并监视张、杨的行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上旬，蒋介石亲自去西安逼迫张、杨进攻红军，镇压西安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且准备撤消张、杨的职务。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广大群众和东北军、西北军广大下级官兵的愤慨。十二月

十二日，张、杨发动了西安事变，在西安临潼华清池扣押了蒋介石。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趁机布置进攻西安，阴谋扩大内战。中国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张国焘主张“杀掉蒋介石”，反对和平解决。伟大领袖毛主席高瞻远瞩地对当时极端复杂的形势进行了深刻地分析，指出必须尽一切努力使西安事变在有利于抗日、有利于人民、有利于革命的条件下获得和平解决。根据毛主席的正确方针，党中央十二月十九日向全国人民发出通电，重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立场，反对亲日派扩大内战的阴谋。接着党中央派周恩来等同志到西安去谈判。在毛主席英明方针指导下，经过我党代表周恩来等同志的努力和斗争，蒋介石终于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条件。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是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伟大胜利。由于这一胜利，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亲日派扩大中国内战的阴谋，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迅速建立创造了基本条件，推动了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而进行的伟大抗日战争的早日实现。因此，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时局的转折点，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的新阶段的开始。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六六、六八）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指抗日战争时期（一九三七年至一

九四五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除汉奸卖国贼以外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其中，包括进步势力（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及其它小资产阶级）、中间势力（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一部分地方实力派和其它爱国分子）和顽固势力（愿意抗日的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因为它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之后，所以称为第二次民族统一战线。

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向华北各省发动了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工农群众的利益，代表全民族的利益，号召全国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党派和全国同胞，联合起来，组成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接着，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及华北地区领导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批判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确定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接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政治报告，奠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理论基础。毛主席指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毛主席严肃地批判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同时又强调指出共产党和红军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

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寇发动了“芦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于八日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在国民党方面，一九三六年底“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条件。这时，蒋介石在人民要求抗日的强大压力下，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与其主子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发生严重冲突，遂于九月二十三日宣布联共抗日。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告形成。

抗战一开始，就存在着两条根本对立的抗战路线的激烈斗争。一条是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采取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的方针和发动千百万群众，大打人民战争，实行全面抗战的路线。另一条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采取对日寇妥协退让方针和不给人民抗日民主自由的反动路线。

为了贯彻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具体地确定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纲领和政策，领导伟大的抗日战争，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党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并决定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八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按抗日战线的战斗序列，又称第十八集团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十月，红军长征时留在长江南北地区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

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党中央洛川会议以后，我党抗日武装，纷纷挺进华北、华中敌后战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

在此期间，蒋介石国民党由于推行反人民的片面抗战路线，结果在日寇进攻面前，一溃千里，在短短的时间内，便丧失了华北、华中的大片土地。

围绕着统一战线问题，共产党内也展开了两条路线斗争。王明这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这时走向另一个极端，从极“左”跳到极右。他借口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共产党，疯狂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完全拜倒在蒋介石国民党的脚下，提出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质上是一切经过国民党、一切服从国民党，不敢同国民党的反动政策作坚决斗争，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放手发展革命武装，不敢在日寇占领区扩大抗日根据地，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蒋介石国民党。

这个时期，刘少奇从白区跑到革命根据地，表面上反对王明路线，把自己吹嘘成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实际上，他早已是叛徒、内奸、工贼，他在白区推行的完全是一条错误路线。他抛出黑《修养》，根本不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谈如何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不谈武装夺取政权，而要共产党员离开伟大的革命实践去搞什么唯心主义的“修养”，宣扬的也是王明那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毛主席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

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政治报告，提出“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的迫切任务，明确指出：“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

一九三八年十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会上，毛主席先后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的报告，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驳斥了王明的种种奇谈怪论，严正指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由于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坚决斗争，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克服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从而保证我党紧紧掌握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保证了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寇占领武汉后，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而以其主力进攻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这时蒋介石国民党则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方针，准备投降日寇，并于一九三九年、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三年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

为了纠正党内执行统一战线政策时发生的“左”和右的倾向，制止蒋介石国民党反共投降危险，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毛主席于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〇年先后发表了《必须制裁反动派》、《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和《论政策》等重要著作。毛主席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并且规定了和顽固派斗争的策略原则：“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毛主席的这些重要著作，武装了全党，大大提高了全党的策略思想和政策水平。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党胜利地打退了蒋介石国民党先后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并使蒋介石不敢轻易同日寇妥协，不敢轻易发动大规模内战，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

抗日战争（六六、七七、八五、一一七、一九三）

抗日战争，是指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进行的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

一九三七年夏天，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七月七日向北京西南的芦沟桥发动进攻，八月十三日又向上海发动进攻，两地爱国军民奋起抵抗，全国规模的抗日战争爆发了。

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内部的各种阶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在毛主席制定的独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引下，中

国共产党联合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团结抗日。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抗日战争初期，发表了《论持久战》等光辉著作，科学地分析了抗日战争中矛盾的各个方面，指出：“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有力地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英明地预见到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和战争发展的全部进程以及最后必然胜利的前途，正确地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战略、战术，对整个抗日战争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分为两个战场：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日寇以主要力量向国民党战场进攻，国民党被迫抗战，军事上单纯防御，压制人民群众抗战，所以十五个月日寇就打到了广州、武汉，侵占了华北、华中的大片土地和华南的一些要地。在同一时间内，中国工农红军和南方的红军游击队，分别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先后开赴华北、华中前线抗击日本侵略军，并在敌后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寇对国民党战场停止了战略进攻，改为政治诱降为主的政策，逐渐把主力转到向解放区进攻。国民党也由被迫抗战，改变为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一九三八年底，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投降日本，在沦陷区成立傀儡政权，

一批国民党将领也先后投敌，组织伪军，协同日寇进攻解放区。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三年，国民党政府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其中一九四一年一月的“皖南事变”，国民党调动八万军队，围攻新四军，是最严重的一次。一九四四年三月，日寇为了打通北平（北京）到广州和南宁的交通线，向国民党战场发动新的进攻，国民党几十万军队不战而溃，几个月内，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广大地区沦于敌手。

在解放区战场上，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八路军、新四军连续粉碎了日寇的“封锁”、“分割”、“扫荡”，使抗日根据地发展到拥有一亿人口。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日寇集中侵华兵力的四分之三，辅以伪军，对解放区进行连续的“扫荡”，实行残酷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这时的抗日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人口缩减到五千万以下。但是，英雄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是杀不绝打不垮的，日寇的暴行更加激起中国人民的仇和恨，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实行精兵简政和减租减息，开展全党整风运动和军民大生产运动，加强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组织敌后武工队，实行地雷战、地道战，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这些政策和措施产生了显著的效果。从一九四三年起，解放区克服了种种困难，开始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这时期，解放区军民抗击了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成为抗日的主要战场。

解放区战场在一九四四年就转入局部地反攻。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对日宣战，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八月九日，毛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

明，指出：“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地解放了东北、华北、华中的广大地区和城市。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下，八月十四日，日本帝国主义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九月二日，日寇正式签署了投降书。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英勇卓绝的抗战，终于打败了号称“东方第一强国”的日本帝国主义。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取得伟大胜利而结束。

八年抗日战争中，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依靠广大人民的支持，由四万人发展成为百万大军，民兵发展到二百多万，对敌作战十二万五千余次，消灭敌伪军一百七十多万，创立了一亿六千万人口的解放区，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革命力量，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胜利准备了有利条件。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是弱国能够打败强国的光辉范例。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及其胜利，不仅直接间接地援助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而且极大地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在世界人民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九四二年整风（一二七、二〇八）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下，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

列宁主义水平，加强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迎接抗日战争最后胜利，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一九四二年，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中，开展了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即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原则整顿作风的运动。

毛主席说：“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

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克服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发展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成熟的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党已经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党。但是，在战争紧张与形势急速变化时期，对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还来不及在全党范围内作彻底地清算，主观主义的倾向，宗派主义的倾向，和作为这两种倾向的表现形式的党八股，还广泛存在于党内，阻碍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进一步统一和团结，阻碍了党的正确路线的进一步贯彻。同时，在抗战以来，我们党又增加了大批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新党员，还缺乏思想改造，“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是摆在党面前的严重矛盾。如不及时的解决，中国革命事业就不可能顺利地前进，党也就不可能健康地发展。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全党整风运动，是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最好方法，也是整个中国革命链条中的一个重

要环节。

为了指导伟大的全党整风运动，毛主席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整风文献，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的学说。在这些著作里，毛主席进一步从思想上总结了过去党内的路线斗争，分析和批判了广泛存在于党内的伪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并规定了整风运动的方针、政策、原则和方法，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整风运动实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大胆揭露和批判过去的错误，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分清是非，找出改正错误的途径，求得矛盾的解决，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种方法，正如毛主席后来在讲到整风运动的方式时所指出的，“**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

一九四二年的整风运动，是一场深刻的无产阶级思想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是一次在全党进行的马列主义的教育运动。全党通过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揭露和清算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尤其是揭露和清算了王明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及其恶劣影响，提高了全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使全党从思想上分清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分清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非无产阶级思想，巩固了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

外的阵地，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和团结，收获很大。经过这次整风运动，深刻地改变了党的面貌，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进一步树立了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优良作风，掌握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即“**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树立了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并帮助广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新党员提高了思想觉悟，使其改变原来立场转到无产阶级的立场，党的工作在各方面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全党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团结。全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毛主席的周围，为党的“七大”的胜利召开，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为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二八）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下，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五百四十四人，候补代表二百零八人，代表着一百二十一万党员。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一九四二年全党整风运动取得伟大胜利的基础上召开的，是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我国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夜召开的。毛主席在题为《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中，深刻地分析了当时的斗争形势，阐明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战斗任务，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

的中国之命运。”“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老中国，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存在于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面前。”“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为了实现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毛主席为全党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毛主席这条彻底的革命路线是夺取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胜利的伟大纲领。它不仅直接打击了蒋介石集团在中国建立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独裁统治的反动政权，而且也给了刘少奇一伙妄图出卖抗战胜利果实，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梦想以沉重的打击。

毛主席在大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毛主席在报告中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分析和比较了抗战以来，在中国就一直存在着的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一条是国民党所坚持的反共、反人民，把中国引向黑暗的旧中国的反动路线；另一条则是共产党所坚持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的正确路线。毛主席全面地总结了我党领导的八年抗战和二十四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党在民主革命阶段和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纲领和政策，坚决反对国民党坚持独裁和内战的反动主张，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主张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指出

农民问题的极端严重性，主张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解放农民；号召全党团结起来，贯彻党的政治路线，发扬党的优良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毛主席在这篇光辉著作中，还进一步阐明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斗争的规律，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理论，是一部具有伟大指导意义的光辉文献。

毛主席在大会上所作的一系列英明指示和题为《愚公移山》的闭幕词，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和全国亿万军民愚公移山的斗争意志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革命精神，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

大会选出了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大会还明确规定了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是全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并写进党章。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全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和团结。这是完成大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夺取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可靠保证。由于“七大”的正确团结方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的：“七大”是“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

解放战争（一一七、一九三、二〇六）

解放战争，也叫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是指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推翻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走狗蒋介石的卖国独裁统治而进行的伟大革命战争。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寇无条件投降，标志着我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日寇投降以前，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英明地预见到抗日战争胜利后阶级斗争的形势，并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八月十三日，毛主席在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中指出：“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毛主席并为全党制定了这场斗争的方针，指出：“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果然，日寇宣布投降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武装援助下，垄断接受日本投降的权利，并积极准备反革命内战。国民党反动派还公然与日伪合流，收编伪军五十多万人，作为抢夺

胜利果实的“先遣军”。八月下旬，蒋介石更进一步命令日寇帮助伪军向解放区进攻。解放区军民坚决执行毛主席规定的“**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和敌伪军的顽抗，为保卫中国人民的胜利果实而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同时，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发表了《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指出：“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

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全面发动内战，玩弄假“和平”花招，三次电邀毛主席到重庆进行谈判。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揭穿美蒋反动派的真面目，团结和教育全党全国人民，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概和革命胆略，于八月二十八日亲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针锋相对的谈判斗争。经过四十三天的谈判斗争，于十月十日发表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蒋介石表面上不得不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会谈纪要》的发表，在政治上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极大的主动，如果蒋介石国民党一旦发动内战，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政治上陷入极大的被动。在去重庆的前两天，毛主席为中央起草了对党内的通知，即《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深刻地分析了日寇投降后两个星期内中国形势的发展，阐明了党中央关于和平谈判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原则以及对各解放区斗争的具体指导方针，

并告戒全党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指出：“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谈判期间，蒋匪军进攻我河北邯郸和山西上党地区。我军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歼灭了进犯的蒋匪军十万多人。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了适应美蒋反动派的需要，趁毛主席在重庆谈判不在延安的机会，抛出了所谓“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总路线和对美蒋反动派的进攻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鼓吹“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的斗争”，要取消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把人民解放军的前身八路军、新四军“统一”为蒋介石的“国防军”，并且要把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大量复员，妄图从根本上取消人民军队，断送中国革命，把中国人民用鲜血夺回的胜利果实双手捧给国民党。

毛主席对刘少奇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毛主席回到延安后，针对刘少奇的叛卖罪行，严正指出：“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一九四六年四月，毛主席在《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文中又强调指出：“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针对这种情况，人民的民主势力对于反动势力，亦应采取同样的原则。”毛主席为全党制定了《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指示全党做好精神和物质上的准备，粉碎蒋介石的全

面武装进攻。

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援助下，蒋介石国民党把“和平”谈判作为缓兵之计，在完成其反革命军事部署后，悍然撕毁了《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①，调动了一百六十万反动兵力，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阴谋早有警惕、早有准备。七月二十日，毛主席向全党发出了《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指出：“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八月，毛主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穿了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本质，武装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思想，鼓舞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意志和必然胜利的信心。毛主席的这一论断，是革命人民的一个根本战略思想，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起了极其伟大的作用。

解放区军民，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正确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和作战方针，英勇地抗击了蒋介石反动军队的进攻，不断地给进犯的敌人以有力地打击。战争的头半年，根据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大量歼灭进犯之敌，消灭了敌人正规军六十六个旅，加上非正规军，共七十一万多人，粉碎了敌人的全面进攻。这时，蒋匪军兵力不足和战线很长

^① 《停战协定》，即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中共代表和国民党政府代表之间共同商定的关于停止军事冲突的协定。这个协定规定双方军队应在一月十三日午夜就各自位置停止军事行动。但是，蒋介石实际上是利用这个停战协定作为布置大规模内战的幌子，在停战令下达的同时，即命令国民党军队“抢占战略要点”，接着又不断地调动军队，向解放区进攻。

的矛盾更加尖锐，到一九四七年二月，蒋介石不得不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三月，毛主席亲自指挥了西北战场的人民解放战争，以两万多人兵力，使二十三万蒋匪军疲于奔命，共歼敌十万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重点进攻。我军经过一年的作战，共消灭了国民党反动军队一百一十二万人。这一伟大胜利，“**奠定了我军歼灭全部敌军、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

遵照毛主席的英明指示，我军于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先后转入了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十月十日，党中央公布了毛主席亲自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向全国人民发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战斗号令。我军由防御转入进攻，标志着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形势的猛烈发展，党领导了解放区人民开展土地革命运动。一九四七年九月，党中央召开了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宣布废除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并立即在各地普遍实行，从而进一步动员广大农民积极支援解放战争。接着，在中国共产党内开展了整党和在军队中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提高了全党和全军的战斗力。这时，刘少奇又以极“左”面貌出现，提出了一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胡说什么“不侵犯中农利益不是绝对的”，土改和整党“不靠干部、政府、党”，要“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要“搬石头”，“踢开村干部”，严重地破坏了党在农村中的路线和政策。毛主席及时地批判了刘少奇的反动路线，亲自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土改、整党、保护工商业等方针、政策，保证了土改、整党和新式整军运动的健

康发展。

在革命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形势下，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党中央在陕北召开了会议，毛主席在会上作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在报告中，毛主席深刻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总结了解放战争以来斗争的主要经验，英明地制定了新形势下党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的行动纲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各条战线迅速获得了辉煌的胜利。自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在解放战争第二年作战中，又歼灭了敌军一百五十二万余人，解放区迅速扩大；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民主运动日益高涨，形成了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蒋介石及其主子美帝国主义已完全孤立。

解放战争的迅速进展，不仅消灭了大量的国民党反动军队，而且连续攻克了大批国民党“重点设防”的城市。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到一九四八年六月，我军已拥有二百八十八万人，后方更加巩固。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从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至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进行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有决定意义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歼灭了蒋匪正规军一百四十四个师（旅），非正规军二十九个师，一百五十四万人，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的绝大部分，以及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三大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上被消灭，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到来。

美蒋反动派为挽救其最后的全面覆灭，又施展出反革命

的两手。一方面搜罗残余的军事力量抵抗人民解放军，一方面再次玩弄“和平”谈判的阴谋。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蒋介石在美帝指使下，发表了一个虚伪的要求“和谈”的声明，演出了一幕战犯求和的丑剧。这时，刘少奇也跳出来，配合美蒋反动派的反革命阴谋，叫喊什么“现在革命形势发展太快”，妄图破坏革命使革命半途而废。为了粉碎美蒋反动派的“和谈”阴谋和刘少奇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毛主席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毛主席指出：“**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为全党全国人民指明了革命斗争的前进方向。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指示全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人民解放军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命令，向着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晨，在西起江西九江市东北的湖口东至江苏江阴的千余里战线上，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以排山倒海之势，浩浩荡荡，强渡长江，一举彻底摧毁蒋介石苦心经营了三个月的所谓“长江防线”。四月二十三日，人民解放军胜利地占领了蒋介石国民党盘踞了二十二年之久的反动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反动政权——蒋家王朝的覆灭。

南京解放以后，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乘胜前

进，追歼穷寇，先后解放了上海、武汉、西安、兰州、广州、福州、重庆、成都等中心城市及广大地区，并用和平方法解放了湖南、新疆、云南等地。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人民解放军已经全部歼灭了中国大陆上的国民党军队，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国大陆。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人民解放军英勇战斗，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五〇年六月，共歼灭国民党反动军队八百零七万人。一九五一年，西藏获得和平解放。这样，除台湾省和若干海上岛屿以外，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为了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和迎接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一九四九年三月，毛主席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主持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在会上作了极其重要的报告。毛主席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在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的中心仍然是政权问题，“**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毛主席特别提醒全党：“**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毛主席预见到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在政治、思想、经济、文化、外交领域中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战斗任务。

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是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光辉文献，奠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纲领，它照耀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历史进程。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主席又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光辉著作，全面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锐利武器。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三十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十月一日，首都北京三十万人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缔造者、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亲自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光荣诞生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伟大的新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从此，中国人民跨进了一个新的伟大历史时期，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沿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航道，乘风破浪，胜利前进！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四九、九八)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发生于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四年，是推翻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

十八世纪末，法国封建制度已经极端腐朽，严重地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当时法国社会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教士，他们有不受法律审判、不交税等特权，高级教士拥有大量土地与财产。第二等级是封建贵族，他们有世代相传的贵族地位，有大量土地，有不交税等特权。第一、二等级人数不到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他们是特权阶级。第三等级是平民，其中包括农民、手工业工人、城市贫民和刚形成的资产阶级。第三等级占全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九，负担着纳税及其它一切义务，但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第三等级中的各阶级、各阶层，由于经济地位不同，在反封建主义的斗争中的动机和目的也不一样。广大农民、手工业工人和城市贫民饥寒交迫，无以为生。农民要求分配土地、废除封建租税、取消封建义务和贵族特权；手工业工人、城市贫民要求平抑物价、特别是面包的售价，严厉制裁投机商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他们还提出“财产均等”的革命要求。因此，劳动人民不仅要求彻底反对封建制度而且要求革命继续深入发展。资产阶级也分为若干阶层。最上层的资产阶级，分享封建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与封建制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要求在维护封建君主政

体的条件下，分享部分政治权利。工商业资产阶级，则想取得政权，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因此，第三等级中的各阶级、各阶层自始就存在着矛盾。

一七八九年五月，国王路易十六召集三级会议，想要解决国家财政困难。到会的第三等级代表与以国王为代表的第一、二等级发生冲突，国王阴谋用武力镇压，局势紧张。七月十四日，巴黎人民发动武装起义，攻占了象征封建统治的巴士底监狱，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爆发了。

武装起义的胜利，使政权开始转到制宪会议（由于第三等级代表坚持把制定宪法作为会议的主要任务，所以三级会议于七月九日改名为制宪会议）手中。与封建制度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最上层的资产阶级在制宪会议中占统治地位。

八月二十七日制宪会议通过了《人权宣言》，宣布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原则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这个宣言维护了资产阶级的地位和私有财产权。它虽然反对封建的等级制度，但是，确定了基于财产条件的不平等，因而它实际上只是资产阶级保护自己阶级利益的工具。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各阶级、各阶层的矛盾日益尖锐。由于掌握政权的斐（音匪）扬派^①不想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因此，一七九二年八月，巴黎人民又发动起义。这次起义后，政权落到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吉伦特派（因这一派的代表多由吉伦特郡中选出而得名）手里。在人民的压力下，他们宣布废除王权，法国为共和国，并且经过审判处死国王路易十

^① 斐扬派，是与封建制度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最上层的资产阶级组成的政治派别。因他们经常在斐扬修道院集会而得名。

六。但是，吉伦特派并不想解决土地问题，不能把革命推向前进，不能使工、农群众从封建制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一七九三年五月，巴黎人民再次发动起义，推翻吉伦特派的统治，由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雅各宾派（因他们经常在圣雅各修道院集会而得名）掌握政权。雅各宾派建立了严格中央集权的资产阶级专政，在人民推动下，采取了比较彻底的革命措施，如没收国王、教会、贵族土地，宣布取消农民所负担的一切封建租税，取消封建特权，烧毁封建契约，对企图恢复封建制度的反革命分子进行镇压等等。但是，雅各宾专政既然是资产阶级专政，就必然不能满足劳动人民更进一步的取消贫富不均的革命要求，反而镇压了他们，因之失去劳动人民的支持。这时，在革命中投机发财的新生的大资产阶级又于一七九四年七月发动政变，推翻雅各宾派的统治，大资产阶级获得政权。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彻底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领导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主力是农民、手工业工人。它推翻了封建制度，为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也促进了其它欧洲国家资本主义的胜利发展。但它是新的剥削压迫代替旧的剥削压迫，在革命中得到利益的是资产阶级，广大工农群众仍旧受着残酷压榨。

巴黎公社^(九八)

巴黎公社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

法国资产阶级在一七八九年的革命中取得政权，无产阶

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逐渐激化。一八四八年六月，法国无产阶级举行了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武装起义。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指出：“这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大交锋。这是为保存或消灭资产阶级制度而进行的战斗。”六月起义被资产阶级残酷镇压下去，但是，敌人的镇压，只能激起无产阶级更为坚决的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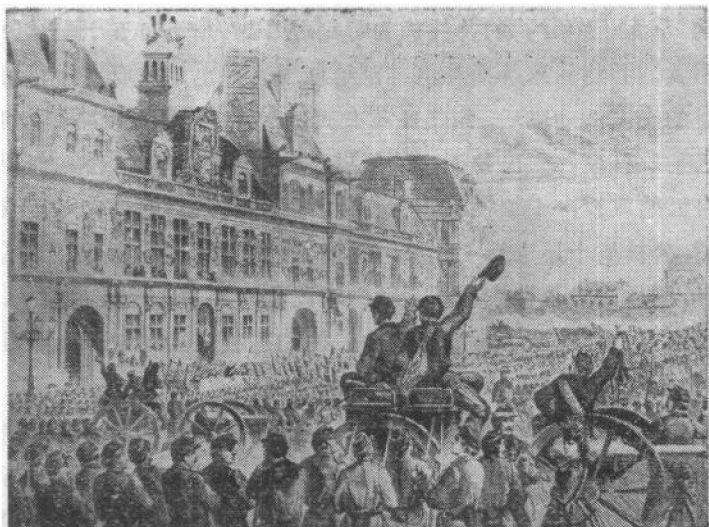
一八七〇年，法国与普鲁士（德意志统一前各邦中的一个主要王国）因掠夺领土和争夺欧洲霸权而进行了战争，法军大败，普鲁士军队围困巴黎。巴黎工人为保卫首都、保卫祖国建立了工人武装——国民自卫军。反动的法国资产阶级组成了所谓“国防政府”，实际上是卖国政府。它害怕工人武装甚于害怕普鲁士军队。它与普鲁士勾结，阴谋策划解除工人武装。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巴黎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在巴黎市区北部蒙马特尔高地上，击退了来抢夺大炮、阴谋解除工人武装的反动军队，当即举行武装起义，占领了政府机关，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狼狈逃窜到离巴黎不远的凡尔赛。巴黎全城解放了。在市政厅和陆军部的大厦上飘起了革命的红旗。

三月十八日的巴黎起义是世界上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三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由人民普选产生了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府——巴黎公社。

公社成立后颁布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的军队，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把枪杆子掌握在无产阶级自己手中。

公社摧毁了资产阶级国家的官僚机构，建立了立法和行



巴黎公社宣告成立时的热烈场面(画)

政统一的新型政权机关——公社委员会。公社工作人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由人民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并可随时撤换。公社废除了资产阶级官僚的高薪制。

公社取消了旧警察和旧法官，建立起新的民选的治安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用以保护人民，镇压敌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在经济上，公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护工人利益，其中有些更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如没收逃亡资本家的工厂企业归工人管理等。

反动的资产阶级十分仇视巴黎公社。逃亡到凡尔赛的以梯也尔为头子的反动政府执行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反革命政策。一八七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梯也尔与普鲁士签订了“和

约”草案。“和约”的条件极为苛刻，法国必须缴付五十亿法郎赔款，并将阿尔萨斯和洛林割给德国。梯也尔政府在进行可耻的卖国活动以后，纠集反革命武装，勾结普鲁士侵略军，向巴黎疯狂反扑。巴黎无产阶级以革命的献身精神，奋起保卫自己的政权，不怕牺牲，浴血战斗。当凡尔赛匪徒攻入巴黎后，公社战士还进行了整整一周的激烈巷战，直至五月二十八日，最后一批公社战士壮烈牺牲在巴黎东部拉雪兹神甫墓地，为保卫公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们这种惊天动地、光照日月的英雄业绩，永远放射着夺目的光辉。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高度赞扬巴黎无产阶级的英勇壮举，并且科学地总结了他们的斗争经验，写下了光辉著作《法兰西内战》，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暴力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巴黎公社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当时还没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同时，公社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在三月十八日革命胜利之后没有乘胜向反革命巢穴凡尔赛进军，没有坚决镇压反革命，这就给了龟缩在凡尔赛的梯也尔反动政府以喘息之机，使它能够重新纠集反动军队，向革命的巴黎猛扑过来。此外，公社没有同农民结成联盟，没有没收资产阶级的法兰西银行。巴黎公社虽然只存在了七十二天，但是它的历史功勋是不可磨灭的。它作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永远闪耀着不可磨灭的战斗光辉。正如马克思指出：“无论公社在巴黎的命运怎样，它必然将遍立于全世界。”“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

是消灭不了的。”“英勇的三月十八日运动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

第一次世界大战_(九四、一八三)

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和争夺世界霸权而进行的非正义的战争。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期。这时正象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所指出的那样：“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日益加剧，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德、美、日等要求重新瓜分世界。帝国主义各国间矛盾的激化，必然引起战争。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的必然产物。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各帝国主义国家就已经形成了以德、奥为首的“同盟国”和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两大军事集团，双方的矛盾日趋激化。一九一四年七月，奥国以其皇太子被塞尔维亚爱国青年刺死为借口，进攻塞尔维亚。八月，德国和英、法、俄（协约国）等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相继参战。接着，土耳其、保加利亚参加同盟国方面作战；日本、意大利和美国参加协约国方面作战。战火遍及欧、亚、非三洲，以欧洲为主要战场。一九一八年八月，中国的北洋军阀政府也被拖入战争，向德奥宣战。

大战的第一年，德国在欧洲西线战场上，以速战速决的战术进攻法国，企图一举打败法国。虽然德军深入法国腹地，但未消灭法军主力。在欧洲东线战场上，俄军向德军发动进攻，遭到失败，德军侵入俄国境内。大战的第二年，德军在东线加强了兵力，向俄军进攻，迫使俄军放弃了大片土地，但迫使俄国投降的目的没有达到。英、法联军虽在西线进行了多次进攻，但进展不大。大战的第三年，德军又在西线发动攻势，企图一举消灭法国军队。德军集中了前所未有的火力猛攻法国的凡尔登，遭到英、法联军的抵抗。双方展开了持续十个月之久的争夺战，最后粉碎了德军的战略计划。连续几年的战争使交战各国，特别是德、奥等国的人力、物力枯竭，同盟国逐渐支持不住。一九一八年九月土、保、奥先后请求投降，十一月十一日德国最后也被迫投降。大战以同盟国集团的失败而告终。

第一次世界大战历时四年多，先后参战的共有三十个左右国家，卷入的人口大约十五亿，约占当时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左右，是人类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浩劫。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巴黎“和会”上签订了关于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凡尔赛和约”。这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为了分赃而炮制的强盗“和约”。根据和约，战胜国英、法、美、日等抢得了许多赃物，瓜分了战败国的殖民地，从而使它们把持了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统治。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战争引起革命的一个典型。在大战期间，以列宁

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①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革命口号，号召各参战国的工农兵掉转枪口来打倒本国的地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伟大列宁领导下，俄国的无产阶级取得了一九一七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俄国脱离了资本主义世界，破坏了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体系，标志着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开始，世界历史进入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期。正如毛主席指出的：“**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

俄国二月革命（五七、九八）

俄国二月革命发生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国旧历），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下的俄国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生在一九〇五年，那次革命没有成功。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统治着俄国人民的沙皇专制政权。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沙皇政府就参加了战争。它妄想通过这场战争扩张领土，进行分赃，此外还想把国内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镇压下去。然而，与沙皇政府的意

^① 布尔什维克是俄语的音译，意为多数派。一九〇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制订党纲、党章时，以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投票选举党中央机关时，以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获得了多数票，称布尔什维克。

愿相反，战争不仅激化了俄国国内的阶级矛盾，而且给广大人民造成严重的饥饿、贫困和死亡，革命形势更加向前发展。在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国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运动日益高涨。一九一七年二月十八日彼得格勒城的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开始罢工，罢工浪潮迅速遍及全城，到二月二十三日，彼得格勒九万名男女工人响应布尔什维克党的号召，举行了政治罢工。第二天罢工人数增加到二十万人。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和示威，高喊“打倒沙皇！打倒战争！”的口号。二十五日罢工发展为总政治罢工。二十六日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总政治罢工发展为武装起义。由于布尔什维克党长期在军队中工作的结果，士兵拒绝向起义群众开枪，并转到起义者方面来。二月二十七日（俄国旧历，公历是三月十二日）起义的工人和士兵群众逮捕了许多沙皇的大臣和将军，推翻了沙皇政权，起义胜利了，并建立了彼得格勒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①。其他地区纷纷起义响应，建立各地区的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但是，当布尔什维克党集中力量领导革命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时，孟什维克^②和社会革命党^③却乘机窃据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等重要城市的苏维埃代表名额的多数。革命胜

① 苏维埃是俄语的音译，意为会议或代表会议。是俄国无产阶级在一九〇五年——一九〇七年革命时期创造的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组织形式，士兵代表主要是被动员作战的农民，所以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实际上是工农专政的机关。

② 孟什维克是俄语的音译，意为少数派。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主要的机会主义派别。

③ 社会革命党是俄国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二月革命后逐渐变成成为代表富农和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利益的反革命政党。

利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又帮助资产阶级组成临时政府。这样，二月革命后，就出现了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俄国二月革命的胜利，是伟大列宁关于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革命路线的胜利。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实现了革命，它显出了英勇精神，它流了鲜血，它率领了极广大的贫苦劳动民众……**”，正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才决定了革命的成功。同时，由于存在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这一重要条件，由于这次革命推翻了极端腐朽反动的沙皇专制制度，为社会主义革命开创了前进的道路。在列宁的领导下，到一九一七年十月，终于完成了从资产阶级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

俄国十月革命（四一、五七、七八、九八）

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俄国旧历），是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取得胜利的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

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窃踞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等城市的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名额的多数，又帮助俄国资产阶级篡夺部分政权，建立了资产阶级专政的临时政府。俄国国内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错综复杂局面。

在革命的转折关头，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从国

外回到了俄国，于四月十六日发表了《四月提纲》，阐明了俄国面临的革命任务，制定了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路线，即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斗争的路线。

四月到七月，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工、农、兵群众中广泛而深入地宣传党的社会主义革命路线，并且揭露临时政府的地主、资产阶级性质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妥协立场，极大地提高了革命群众的政治觉悟。同时，在工、农、兵群众中，为建立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革命联盟而进行了巨大的组织和发动工作。在此期间，临时政府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伙同下，加强了反革命的武装力量，在七月间残酷地镇压了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举行的反对临时政府反人民政策的游行示威，在全国各地实行白色恐怖。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把持的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此时完全变成临时政府的附属品，全部政权已落入临时政府手中，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结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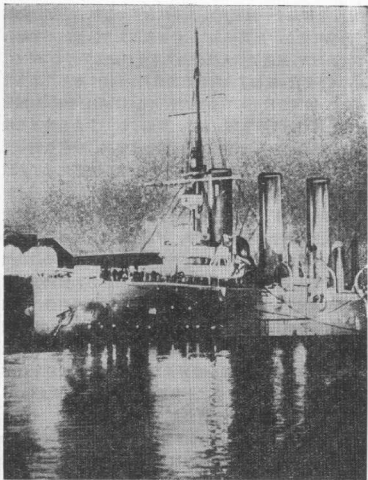
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布尔什维克党于七月底八月初秘密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制定了通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针。会后组织赤卫队，进行军事训练。十月十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十月十六日，又召开中央扩大会议，决定了起义的日期，并在中央委员会上，选出了以斯大林等同志组成的实际领导武装起义的军事总部。布尔什维克党几个月来进行的大量而深入的宣传、组织工作，收到显著成效，这时全国各地的苏维埃大部分转向布尔什维克。

由于叛徒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的告密，根据列宁的指

示,决定于十月二十四日提前发动起义。十月二十五日(俄国旧历,公历是十一月七日),赤卫队和革命军队占领了除冬宫外的重要据点,“阿芙乐尔”巡洋舰轰击资产阶级的反动巢穴冬宫的炮声,报道了伟大社会主义革命新纪元的开始,深夜二时,攻下冬宫,逮捕了临时政府的成员。同日,布尔什维克党公布《告俄国公民书》,宣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已转归苏维埃掌握。次日,组成了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政府。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以后直到一九一八年二月,全国其他地区都通过武装起义,先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冲破了世界帝国主义战线,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同时也开辟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新纪元。斯大林指出,十月革命“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俄国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取得解放的必由之路。毛主席说:“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来,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引起了国际帝国主义的极大恐慌。世界各国反动派害怕全世界劳动人民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榜样,拿起武器推翻他们的反动统治,因而对苏联进行了疯狂的武装干涉,妄图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一九一八年春,以英、法、美、日等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的



“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声报道了伟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纪元

干涉军先后进犯苏维埃国家，侵占大片土地并扶植傀儡政权，发动武装叛乱。最严重时，四分之三的领土陷入敌人之手；苏维埃国家几乎处在四面包围之中。但是苏联人民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平息了国内反革命叛乱，并于一九二〇年最后粉碎了十四个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保卫了年轻的苏维埃政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九四、一八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指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间，德、意、日法西斯国家掀起的世界战争。先后共有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二十亿以上的人口卷入了这场空前规模的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社会主义苏联的出现，世界上产生了一个新的大矛盾：社会主义苏联同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旧世界所固有的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发展得更加尖锐了，更加扩大了。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又互相勾结，逐渐形成英、法、美和德、意、日两大集团。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力图重新瓜分世界，对弱小国家进行一系列侵略；英、法、美为了维持其世界霸权，并诱使德、意、日进攻苏联，对它们的侵略活动，加以纵容。在大战之前，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一九三一年)，后又发动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一九三七年)；意大利侵占了埃塞俄比亚(一九三六年)、阿尔巴尼亚(一九三九年)；德国侵占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这一系列的侵略活动，激起了被侵略国家人民的强烈反抗，用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反对法西斯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另一方面，这也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

矛盾，引起大战的爆发。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国进攻波兰。九月三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一年间，德国迅速侵占西欧和巴尔干半岛，迫使法国投降（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二日），英军被迫退出西欧大陆。随后，德国加紧侵略东南欧各国，意大利夺取英、法在地中海和非洲的殖民地。欧洲和非洲被侵略国家的人民展开了反法西斯的民族解放战争。这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初期阶段（一九三九年九月至一九四一年六月）。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阶段，战争的性质，“无论在英法方面，或德国方面，都是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的战争”。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国突然进攻苏联。在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下，苏联人民的伟大卫国战争开始了。这使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九四一年六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毛主席说：“苏联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不仅是保卫苏联的，而且也是保卫正在进行反对法西斯奴役的解放斗争的一切民族的。”苏联的参战，有力地支持和鼓舞了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民族解放战争。这时，英、美也迫于形势，同苏联结成反法西斯联盟。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时间为七日），日本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海军基地——珍珠港，并侵略太平洋各岛屿和东南亚广大地区，太平洋战争爆发。

在东方战场上，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挫败国民党反动派妥协投降的阴谋，进行英勇的抗日战争，肩负着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重担。中国人民

的抗日战争，极大地援助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极大地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并使美、英有了喘息机会，组织力量反攻日本。

苏德战场是大战的主要战场。从一九四一年六月到一九四二年秋季，苏联红军和苏联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下，采用积极的防御战，粉碎了德国法西斯的多次进攻，大量歼灭了它的有生力量，并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三年二月，斯大林指挥的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大会战中，歼灭德国侵略军三十多万，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毛主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一文中指出：“这一战，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此后，苏军开始反攻，德军节节败退。在这期间，英、美军队在北非获胜，并在意大利登陆。一九四三年九月，意大利投降。英、美在德军即将崩溃时，于一九四四年六月才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进攻德国。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国无条件投降。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对日宣战。中、朝两国人民武装和苏联红军并肩作战，击溃了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侵略军主力——关东军。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反法西斯各国人民的胜利而结束。

毛主席说：“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就是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孙 中 山(六六、八四)

孙中山，名文，字逸仙。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生在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翠亨村，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在北京病逝。

孙中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伟大革命家，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一八九四年，孙中山建立兴中会。一九〇五年，兴中会、



孙 中 山

光复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联合组成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选为总理。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治纲领，孙中山接着又发表了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进一步阐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原则和纲领。同盟会成立后，

领导过多次反清武装起义，较大的有潮州黄冈起义、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广州起义等。这些武装起义，为辛亥革命奠定了基础。

孙中山在革命实践中认识到改良主义的危害，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展开了斗争。当时，改良派打着改革的旗号，鼓吹君主立宪^①，分裂革命组织，维护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孙中山尖锐地指出：“保皇、革命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同盟会创办《民报》，同改良派进行了长期激烈的论战。结果，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取得胜利，民主革命思想深入人心，为辛亥革命作了思想准备。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在同盟会领导下举行了武昌起义，即辛亥革命，各省纷纷响应，宣布脱离清朝统治。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并组成临时参议院。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革命党人同袁世凯妥协。孙中山于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支持下，当上了大总统。同年八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孙中山被选为理事长。此后，孙中山发动了讨袁战争（讨伐袁世凯）等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但都遭到失败。

^① 君主立宪，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政权形式。这种政权形式仍然保留皇帝或国王，但用资产阶级的宪法和议会约束他的权力。君主立宪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妥协的产物。康有为等当时鼓吹君主立宪，完全是反动的。因为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已经提出彻底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口号和纲领，而清朝统治者正采用“预备立宪”的花招来麻痹人民。这时鼓吹君主立宪，就是同清朝封建统治者唱一个调。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一九一九年的中国五四运动，都给绝望中的孙中山以新的希望；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孙中山以极大的影响；中国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给孙中山以极大的鼓舞。一九二三年，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并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改组了中国国民党，发表了改组宣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根据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国、共两党结成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使中国革命得到空前的发展。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和《纪念孙中山先生》等文章中，对孙中山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毛主席说：“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象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鲁 迅（二一四、二一五）

鲁迅，原名周树人，鲁迅是他的笔名，一八八一年九月二

十五日诞生在浙江绍兴，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在上海病逝。

鲁迅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一生，是革命的战斗的一生。五四运动时期，鲁迅在北京参加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五四运动前后，鲁迅写了许多著名的短篇小说和杂文，用他那支锋利泼辣的



鲁 迅

笔，向着反动腐朽的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进行英勇的冲击，无情地批判了整个人吃人的旧世界。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是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一九二六年，鲁迅在北洋军阀政府压迫下，离开北京，先后在厦门、广州教书，并继续进行文化战线的革命斗争。

一九二七年夏，国民党叛变革命，鲁迅在这年十月从广州到上海。此后，鲁迅在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斗争中，在阶级斗争的血的教训面前，认真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地严格地“解剖自己”，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树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从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鲁迅在他后期的光辉的十年中，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向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向文化战线上的各种鬼魅，向混进革命队伍的一些假马克思主义骗子，进行了英勇坚决的斗争。在这十年里，国民党反动派和钻进革命阵营内部的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等对鲁迅进行了种种反革命“围剿”，但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坚持斗争，毫不动摇，“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鲁迅在这个时期里，写下了许多革命的斗争的杂文，狠狠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主要杂文集有《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且介亭杂文》等。

特别是在晚年，鲁迅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正确立场上。鲁迅捍卫了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痛斥了周扬一类政治骗子推行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投降路线。鲁迅提出和坚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口号，反对和批判周扬一伙的“国防文学”的投降主义口号，揭露了他们投降国民党反动派、宣传卖国主义和叛徒哲学的罪行。毛主席领导的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鲁迅曾经专门拍电报前去致敬和祝贺，说：“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希望”。鲁迅在逝世前不久，发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痛斥了托派的谬论，维护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并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这充分表达了鲁迅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无限热爱和崇敬的心情。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等光辉著作中，对鲁迅作了高度的评价。毛主席说：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老子(一八二)

老子,有的历史书记载说,他名叫李耳,是两千四百多年以前的人。老子是我国古代哲学史上道家学派的创始人,留传下来的书叫《老子》,又叫《道德经》。

老子的书里,包含着不少朴素的辩证法观点。他认为,长短、上下、有无、难易等对立的方面,都是互相依赖、互相转化的。他曾说:“祸兮(音希)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句话译成白话是:“灾祸啊紧靠着幸福,幸福啊埋藏着灾祸”,也就是说,坏事(祸)会转化成好事(福),好事也会转化成坏事。老子看到相反的事物会互相转化,从这一点说,是正确的辩证法观点。因此,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引用了老子上面两句话,教导我们要全面地看问题,要看到“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

但是,老子的整个思想体系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所以,上面这种辩证法观点,在老子那里,仍然受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支配,存在着严重错误。第一,老子认为,有一个超越客观事物的,也就是唯心主义的“道”决定着、主宰着一切。象祸、福的转化,也是由“道”决定着它们变来变去。第二,老子认为,象祸、福这种互相转化,是没有完的、简单的循环。这就陷入形而上学。这样,辩证唯物主义中有关转化的许多重要

原理，如矛盾双方的转化，必须经过斗争，必须具有一定的条件；矛盾双方的转化，不是循环，而是引起事物向前发展，等等，都是老子思想中所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

孙 子_(六一)

孙子，据一些历史书的记载，名字叫孙武，活动的时期在二千四百多年以前。

孙子是中国古代的军事学家。他写了一部书后世就叫它《孙子》（也叫《孙子兵法》），是我国最早的军事著作，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还曾经译成许多种外文。这本书分为十三篇，一共六千多字。孙子在书里总结了古代的军事经验，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例如书中《谋攻》这一篇里说：“故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音带）；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把它译成白话就是：“所以说，了解敌人一方也了解自己一方，打一百次仗也不会有失败的危险；不了解敌人一方只了解自己一方，胜败的可能各占一半；既不了解敌人一方，又不了解自己一方，每次打仗都有失败的危险。”这说明，孙子根据打仗的经验，懂得了解情况、看问题，应当注意敌我两方面，才能避免片面性，取得胜利，也说明孙子认为战争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说：“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

孙子的军事思想在我国历史上有相当的地位。但是，他的兵法毕竟是为当时统治阶级争城夺地服务的，不可能全面认识战争的规律，更不可能认识战争的本质。

魏 徵(六一)

魏徵(五八〇——六四三年)，唐朝初年的宰相，主持编写过历史书籍。

魏徵为了维护唐朝的封建统治，积极向唐朝统治者出谋划策，向唐太宗(李世民)提出和发表过许多有关巩固唐朝政权的建议和见解。“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就是他发表的许多政治见解之一。

关于魏徵发表的这一政治见解，在古代历史书《资治通鉴》和《新唐书·魏徵传》中都有记载，大意如下：唐太宗问魏徵：“当帝王的怎样就能明智，怎样就会昏暗？”魏徵回答：“能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能明智；只听信一方面的话，就会昏暗。”接着，魏徵列举了传说中的中国远古帝王，说他们由于能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所以不会受到坏人的蒙蔽；又列举了后来历史上的一些帝王，说他们由于只听取一方面的意见，结果，有的当统治阶级其它集团带兵打到京城，他还不知道；有的甚至在全国农民纷纷起来造反、他的政权已经土崩瓦解，他还蒙在鼓里。魏徵由此得出结论说：“所以说，当帝王的能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不会受到坏人的蒙蔽，下情也就能够上达了。”

早在一千三百多年前，魏徵能够提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见解，是可贵的。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指出：“唐朝人魏徵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

毛主席在这里引用魏徵的这一句话来启发、教育我们，看问题、研究问题，要防止片面性，要了解矛盾各方面的特点，从而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做好工作，完成革命任务。

魏徵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是有强烈的阶级性的。魏徵要帝王“兼听”，不要“偏信”，完全是从维护唐朝政权、巩固唐朝的封建统治出发的。这就决定了他所谓的“兼听”，只能是“兼听”当权的封建统治集团，充其量也只能是“兼听”地主阶级的“各方面”意见，以便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封建统治；至于当时广大的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手工业者的意见和要求，他们是根本不听的。魏徵主张的“下情上达”，也并不是要封建统治者听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要求，只不过是说，应当了解下面的情况，便于及时采取对策，以巩固封建统治而已。

哥白尼(一六五)

哥白尼(一四七二——一五四三年)，是十六世纪波兰伟大的天文学家，新的宇宙体系、即太阳中心说的创立者。

在十六世纪以前，地球中心说一直占着统治地位。这个学说认为：地球是不动的，是宇宙的中心；整个宇宙(太阳、行星和整个天空)都有层次地围绕着地球旋转。哥白尼否定了这种谬论，创立了太阳中心说。他在《天体运行》一书中，证明了地球自转，并和其它行星一起，围绕太阳旋转，推翻了二千年来地球不动的学说。

过去宗教神学都认为地球是“上帝”创造的，“上帝”选定地球为宇宙的中心。哥白尼提出太阳中心说，实质上就是否

定了“上帝”的作用。哥白尼的理论沉重地打击了宗教神学关于“上帝”创造世界的谬论，并为后来天文学的科学发展创造了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予哥白尼的学说以高度的评价。恩格斯说：哥白尼的书出版后，“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

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自从创立以来，一直被宗教反动势力当作“异端邪说”，遭到围攻和压制。哥白尼的书被烧毁，宣传他的学说的人受迫害，意大利学者布鲁诺（一五四八——一六〇〇年），由于继承和宣传哥白尼的学说，就被宗教势力的反动组织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但是，剥削阶级的残酷镇压，并不能阻挡真理的传播。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在同宗教神学的斗争中，终于取得了胜利并继续发展。

达尔文（一六五）

达尔文（一八〇九——一八八二年），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创立者。主要著作有《物种起源》、《动植物在驯化状态下的变异》、《人类起源》等。

多少世纪以来，剥削阶级总是利用“上帝”创造世界、“上帝”创造人这种虚伪的宗教观点来欺骗劳动人民，达到巩固其反动统治的目的。就是在专门研究动植物发生、发展规律的生物学领域里，同样也是这种唯心主义观点和宗教欺骗占据统治地位，认为一切生物都是不变的，“上帝”是一切生物的创造主。达尔文根据长期的实地科学考察，研究了许多生物界的现象，创立了生物进化学说，摧毁了这种谬论。恩格斯高度

评价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这是十九世纪的伟大发现之一。

按照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生物界具有悠久的历史，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以现成状态一下子出现的，更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在自然条件的作用下，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逐渐变化发展而成的。人类就是生物发展的结果，是从一种古猿进化而成的。达尔文的进化论还认为，生物在发展进化过程中，一部分适宜于生存的生物得到保留和产生后代，一部分则灭亡，这种过程叫做“自然选择”。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主要手段，是生物界本身固有的客观规律。这也击破了生物发展是由“神力”引起的荒唐神话。

达尔文对于生物发展规律所作的科学解释，是对各种唯心主义谬论和宗教迷信的有力的打击。因此，达尔文的进化论从产生的时候起，就被宗教反动势力当作“毒草”，遭到围攻和压制。但是，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的那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达尔文的进化论经过艰苦、激烈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和发展。

达尔文是一个资产阶级生物学家，他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他在生物学方面坚持了唯物主义立场，而对社会发展的观点则是唯心主义的。但是，在当时说来，达尔文进化学说的诞生是十九世纪生物科学中唯物主义的胜利。正如列宁指出的：“**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种看做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续性。**”

黑格尔(四三)

黑格尔(一七七〇——一八三一年),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最出名的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精神现象学》、《逻辑》、《自然哲学》等。

黑格尔创立了一个庞大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他编造了一个超物质的“绝对精神”(又叫“绝对观念”);他的整个哲学体系就是讲这个“绝对精神”如何辩证发展的。他认为,“绝对精神”的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地球、自然界产生之前,是这个“绝对精神”超时空、超自然、超社会地自己发展。第二阶段,是“绝对精神”体现为自然界而发展,就是“绝对精神”在背后操纵着自然界发展。第三阶段,是“绝对精神”体现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的思想、意识,就是“绝对精神”的表现。显然,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就是哲学化了的“上帝”。他用了许多玄虚的理论,否认物质的第一性,宣扬精神创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与“上帝”创造一切的宗教谬论本质上完全一样,是不科学的、反动的。但是,黑格尔哲学又有丰富的辩证思想,例如他认为:一切都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发展是有规律性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源泉是内部矛盾,在发展中进行着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等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

毛主席指出：“生活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期的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对于辩证法曾经给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他的辩证法却是唯心的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给黑格尔唯心的辩证法以革命的改造，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部分，而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创立了唯物辩证法。正如马克思所说：“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他甚至在观念的名称下把它变成了独立的主体）是现实的创造主，而现实只是创造主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性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性的东西而已。”

陈独秀(六七、一〇五)

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后来堕落为托派、叛徒。

陈独秀是安徽怀宁人,官僚地主家庭出身。曾经去日本留学,一九一五年主编《新青年》杂志,一九一六年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宣传资产阶级的科学、民主思想,当时他是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派。由于他在五四运动时期在知识分子中有些名气和中国共产党还在初创时期,还不善于识别真假马列主义,因此,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他当了总书记。实际上,他根本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甚至认为中国没有奴隶社会,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他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只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也只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他叫嚷中国无产阶级“很幼稚”,还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只能站在消极帮助的地位”,而不能成为领导阶级,他根本拒绝毛主席关于“**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的正确意见,放弃了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同时,他还诬蔑农民“散漫”、“保守”、“难以加入革命”,胡说什么资产阶级“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重要社会基础,革命党须取得民族资产阶级的充分援助”。基于这些谬论,在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达到高潮的时期,他要各地党组织压制农民运动,解散

农民武装，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在统一战线中，只讲联合，不讲斗争，对国民党实行妥协退让的政策。工农群众起来了，他唯恐吓坏了资产阶级，采取指责、压制的态度，下令“农民不得进城武装斗争”。在革命紧急时刻，陈独秀及其追随者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竟然命令武汉工人纠察队将武装交给国民党，甚至连童子军的木棍也捆得整整齐齐交给汪精卫。当地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时候，广大革命群众手无寸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九三九年指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这也就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撤消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陈独秀仍然坚持他的反动观点，公然打出取消主义的旗号。他采取托洛茨基的反动立场，认为蒋介石反动政府的建立，表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无产阶级只能去搞合法的议会斗争，等待将来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以后，再去搞社会主义革命，这也就是取消中国革命。他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诬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一九二九年，陈独秀公开和托洛茨基分子相勾结，奉托洛茨基为首领，形成反革命小组织，进行分裂党的罪恶活动，完全堕落成为帝国主义和

国民党反动派反对革命反对人民的卑鄙工具。同年十一月，叛徒陈独秀被清除出党。一九四二年死于四川的江津，落得个可耻的下场。

张国焘(一〇五)

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内的老牌机会主义者，后来堕落为叛徒、特务。

张国焘是江西萍乡人，大地主家庭出身，早年投机革命，混入中国共产党。张国焘在历史上屡犯路线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损失。开始，他搞过工人运动，在工作中即进行无原则的小组织活动。他诬蔑农民“没有政治兴趣”，否认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犯了否认农民运动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在一九二三年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反对国、共两党合作，认为共产党和工人参加国民革命，就是和资产阶级妥协，使共产党“变色”，以极“左”的面目，破坏党的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贯彻执行；后来他又转为右倾，成了陈独秀的左右手。在一九二八年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国焘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一九三一年以后，他先是紧跟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执行肃反扩大化等一系列的“左”倾政策；随后又转为右倾，在敌人进攻面前畏敌如虎，实行退却逃跑主义。在红军长征途中，一九三五年六月一、四方面军汇合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的罪行，是他的机会主义错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集中表现。

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向华北地区发动新的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为了迎接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党中央、毛主席决定红军继续北上。但是，窃取红军第四方面军领导职务的个人野心家张国焘，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极力地反对红军北上抗日，提出向四川、西康之间少数民族区域无限制退却的逃跑主义路线，以求得与国民党反动派的“休战”。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决定红军继续北上抗日，向陕西、甘肃挺进。可是，张国焘顽固坚持其错误立场，拒绝党的批评教育，当红军长征到达四川松潘县时，他不服从中央命令，公然拒绝与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抗日，擅自带领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部队南下，分裂党和红军，并企图以武力危害中央。八月，党中央在四川松潘县城西北的巴西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即巴西会议），谴责了张国焘的罪恶活动，决定脱离危险区域。红一方面军在毛主席率领下，十月到达陕北保安县（今吴旗县），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而张国焘则不顾党中央的命令，继续带领被他蒙骗和强制的一部分红军南下，向四川、西康边境的天全、芦山、大小金川及阿坝一带退却，并在绰（音抄）木碉非法地另立“中央”，公开打出了叛党黑旗，破坏了党、红军的统一和团结。由于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对受蒙蔽的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迫使张国焘不得不取消他的伪中央组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则是革命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他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

一九三六年六月，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在毛主席

革命路线的感召和教育下，抵制了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与红二方面军一起北上。但是，张国焘仍然坚持其反党立场，坚持他一贯的退却逃跑主义和取消主义路线，一九三六年秋，当红二、四方面军从西康东北部出发，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后，张国焘又以欺骗手段，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两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西进，结果使这部分红军遭到惨重损失。毛主席指出：“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破产。”

一九三七年四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即延安会议），对张国焘的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作了系统的批判和总结。张国焘本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但他继续采取两面派手法，表面上表示服从，实际上顽固地拒绝挽救，准备最后叛党。一九三八年四月，张国焘借祭黄帝陵为名，逃出陕甘宁边区，公开叛党，先后跑到西安、武汉，单独一个人（连跟随他多年的警卫员，也拒绝跟他）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可耻的叛徒和特务。同年四月十八日，党中央决定把他清除出党。毛主席指出：“张国焘是向党中央闹独立性的，结果闹到叛党，做特务去了。”

张国焘的一系列反党阴谋活动，破坏党的统一纪律，是同他的两面作风密切结合的。毛主席在总结我们党同张国焘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时指出：“在反倾向的斗争中，反对两面派的行为，是值得严重地注意的。因为两面派行为的最大的危险性，在于它可能发展到小组织行动；张国焘的历史就是证据。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这就

是两面派行为的表现。必须提高干部和党员对于两面派行为的注意力，才能巩固党的纪律。”“有些破坏纪律的人，是由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党的纪律；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张国焘，则利用许多党员的无知以售其奸。因此，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

托洛茨基(一〇五)

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〇年)是苏联托洛茨基反革命集团的头子，从一九三〇年起就与孟什维克一起反对列宁，十月革命前夕混进布尔什维克党。他所纠集的托洛茨基集团原是俄国工人运动中一个反对列宁主义的派别，由于不断进行反党、反列宁主义的活动，最后走上勾结各种反革命分子，疯狂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罪恶道路，完全堕落成为反革命的匪帮。

托洛茨基狡猾地把他的“理论”标榜为“不断革命”论，实际上这是彻头彻尾的不断反革命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是根本对立的。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在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开始提出，在以后各个革命时期又披上不同的外衣。它的要点是：一、无产阶级在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甚至会 and 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因而托洛茨基主张

跳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一贯否认农民是革命力量，否认无产阶级能领导农民。因此，托洛茨基的这一“理论”实际上又反对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二、无产阶级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托洛茨基反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一个国家胜利的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在俄国一个国家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只能等到欧洲其它国家发生革命时一起取得胜利。十月革命胜利的事实粉碎了托洛茨基的谬论，但是他仍然坚持其反动“理论”，认为只有立刻发生世界革命，苏联才能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以此反对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三、根据这种“理论”，托洛茨基还胡说什么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是不能克服的，必然引起“内战”。他把这种“敌对的冲突”和“内战”说成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这在实际上就是取消工农联盟，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一出笼，就遭到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尖锐批判。列宁把他这种谬论称为“荒唐的左的‘不断革命’。”斯大林指出：托洛茨基主义是以“‘左的’和最最最革命的词句掩饰自己的机会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先锋队。”

托洛茨基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在十月革命前夕，他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向敌人泄露了预定的起义日期。一九一八年初，托洛茨基伙同布哈林反对列宁关于签订对德和约的主张，阴谋怂恿德帝国主义加紧对苏联的军事进

攻^①。在列宁逝世以后，托洛茨基狡猾地改变了“策略”，竭力装出赞扬、称颂的姿态，把列宁称为“天才人物中最有天才的人”。但是，正如斯大林指出的：“这里也含有战略上的诡计”，他以虚伪地歌颂列宁为幌子，而把锋芒对准列宁主义的真正捍卫者——斯大林。他不仅到处建立反党联盟，在其同伙中征收党费，散布其反动的政治纲领，建立秘密印刷所，甚至组织了反对苏联政府的示威游行，公然地反对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联共（布）中央决定把托洛茨基及其同伙开除出党。一九二九年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苏联国境。一九四〇年死于国外。

后来查明，托洛茨基早就伙同布哈林等阴谋暗害列宁，里通外国，出卖情报，干了大量凶杀、破坏的罪恶勾当。开除出党后，他勾结其他反党力量和国际帝国主义，变本加厉地进行阴谋暗害活动。正如斯大林一九三七年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作的报告里指出的：“现时的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而是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用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

① 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为了退出帝国主义战争，集中力量巩固十月革命已经取得的胜利，从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开始，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城与德国方面进行谈判。尽管德国方面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仍然坚决主张签订和约。因为这样可以赢得时间，整顿国家经济、建立红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托洛茨基、布哈林一伙，用“左”的词句，反对以列宁为首的党中央的主张，进行了种种破坏活动，使苏维埃政权遭受更大的损失。最后于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苏联同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签订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赢得了时间，巩固了苏维埃政权，为后来击退帝国主义武装进攻创造了条件。德国战败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了这个条约。

几十年来，托洛茨基匪帮在许多国家里活动。托洛茨基的魔爪也早已伸到中国来。在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受失败之后，中国也出现了少数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叛徒相勾结，于一九二九年形成反革命小组织，胡说蒋介石反动政府的建立，表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无产阶级只能去搞合法的议会斗争，等待将来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以后，再去搞所谓社会主义革命，这也就是取消中国革命。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公开参加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完全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对人民、反对革命的卑鄙工具。在“九一八”事变后，他们接受托洛茨基匪贼的“不阻碍日本帝国占领中国”的指令，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的津贴，从事各种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罪恶阴谋活动。

布哈林(四九、一〇五)

布哈林(一八八八——一九三八年)，原来是俄国革命运动中反对列宁主义的机会主义派别的头子，后来堕落成为反党叛国分子。

布哈林一贯反对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前夕，布哈林对农民不作阶级分析地胡说农民已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决不会跟工人阶级走，站在托洛茨基的立场，反对进行武装起义，反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工农联盟。一九一八年，布哈林组织反党集团“左派共产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一起反对列宁，主张继续战争，阴谋破坏对德和约的签订。对德和约签订后，布哈林又宣扬托洛茨基的俄国一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谬

论，反对苏维埃政权利用当时的时机，抓紧社会主义建设。他们这些谬论和阴谋，都被列宁的革命路线所粉碎。

布哈林的机会主义路线，最突出地表现在他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上。十月革命后，他一贯鼓吹富农和资本家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一九二八年，正当苏联共产党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向农村资产阶级——富农展开坚决进攻的时候，布哈林伙同另一反党头子李可夫，进一步公开为富农辩护，反对消灭城乡资本主义成分，而主张让它自由发展。他们胡说，社会主义取得的成就愈多，阶级斗争就会愈缓和；阶级斗争很快就会完全熄灭下去，阶级敌人将会不经过抵抗而让出自己的一切阵地；因此就根本用不着进攻富农，等等，用这些谬论来反对当时进行的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斯大林一针见血地指出，布哈林的这种反革命言论的害处在于“麻痹工人阶级，破坏我国革命力量的动员准备，涣散工人阶级，便利资本主义分子向苏维埃政权进攻”。

由于布哈林、李可夫集团同托洛茨基分子勾结一起搞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苏共（布）中央十一月全会把布哈林从中央政治局开除出去。可是布哈林大耍两面派，假装承认错误，继续进行反党活动。

一九三七年，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的反党叛国阴谋被彻底揭露，查明他们在一九一八年春阴谋策划逮捕和杀害列宁、斯大林等领导人；一九一八年夏谋害列宁并把列宁刺伤；在列宁卧病时和逝世后，阴谋推翻党的领导；与外国间谍机关勾结，出卖国家机密；等等。苏联法庭对布哈林进行了公审，一九三八年布哈林被判处枪决。

德波林(三五、四九)

德波林(一八八一——一九六三年)，苏联修正主义哲学家。

在十月革命前，德波林曾经长期参加反对列宁的孟什维克派，十月革命后，他又打着拥护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旗号，以党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家”的面貌出现，继续宣扬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德波林学派鼓吹哲学脱离政治，理论脱离实际。他们歪曲和攻击唯物辩证法，竭力否认矛盾的普遍性，认为事物的发展是“从单纯的等同，经过差异和对立而达到极端的矛盾”，否认事物自始至终都贯穿着矛盾。他们反对经过对立面的斗争来解决矛盾，鼓吹对立面的“互相调和”来“解决”矛盾。当时，苏联人民正在苏联共产党(布)和斯大林的领导下，为实现列宁关于全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总路线而斗争；苏联共产党(布)内的布哈林等反党集团，为了维护资本家、富农阶级的利益，抹煞阶级斗争，鼓吹阶级合作，反对列宁的革命路线。德波林一伙这时站出来歪曲和攻击唯物辩证法，为反党集团提供了“理论”武器。

从三十年代起，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哲学界对德波林学派的修正主义观点进行了批判和斗争。但是，自从赫鲁晓夫上台以后，苏联修正主义者又再次拾起被批判过的德波林破烂的哲学衣钵，甚至对德波林本人加以颂扬和美化。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德波林哲学观点的实质，是“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和机械论”，并指出“德波林的唯心论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极坏的影响”。王明一伙“左”右倾机会主义者就是德波林修正主义思想的鼓吹者和实行者。